



證道學
THEOSOPHY
無高於真理之宗教



伍廷芳与证道学

从外交舞台到灵学探索：中国证道学发展史

2025年12月28日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您可通过以下途径观看本视频：

- “证道学世界”公众号。订阅关注可获得最新讲座、书籍及活动信息
- 在官网的“证道学入门视频”一栏里免费下载
- 在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YouTube 网站上观看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2025年系列讲座 9



證道學
THEOSOPHY
無高於真理之宗教



伍廷芳与证道学

从外交舞台到灵学探索：中国证道学发展史

2025年12月28日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加坡证道学学会的讲堂。我来简短介绍一下今天讲座的历史背景和嘉宾。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中文项目

全球唯一用中文系统性介绍证道学的会所

- 2011年12月3日，证道学中文项目正式开启
- 2012年3月3日，Tan Bee Kheng建立中文网站 Chinesetheosophy.net
- 2012年，侯朝雄先生组织翻译并发行第一本证道学中文书籍《永恒的智慧》 (Ageless Wisdom)



新加坡会所
由第一任全球会长阿尔科特
于1889年1月24日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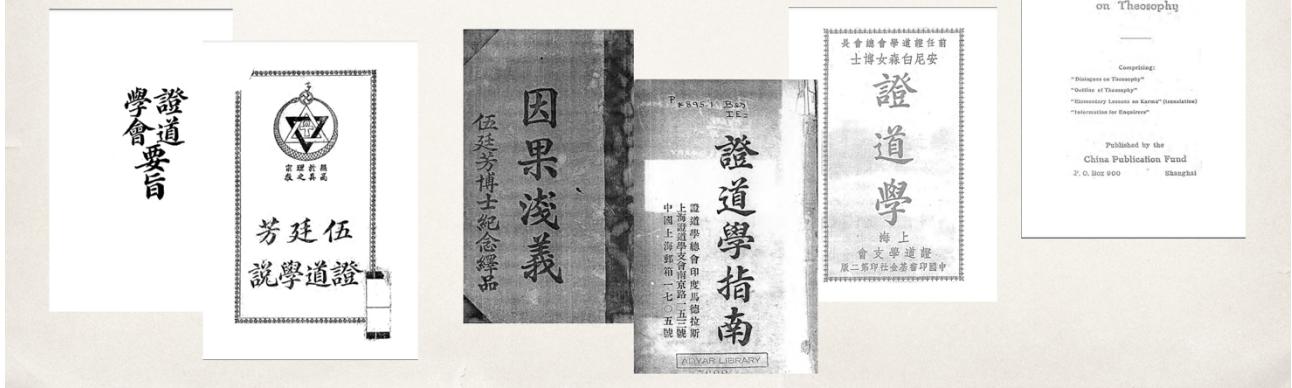
新加坡的会所由首任全球会长阿尔科特在 1889 年创立，马上进入第 137 个周年纪念日了。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新加坡的学会要做一个关于伍廷芳和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的讲座呢？这是因为，在 2011 年年底时，在学会的印度洋太平洋联盟的倡议下，新加坡学会正式开启了一个中文项目，目的就是用中文广布证道学。

在 2012 年初，我们建立了中文网站，同年，第一本中文书籍《永恒的智慧》在候朝雄先生的带领下发行了。这使得新加坡的学会成了全球唯一用中文系统性介绍证道学的会所。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1. 总部阿迪亚图书馆藏书

• 2012年9月8日，会长钟山儿在总部阿迪亚图书馆里找到一些中文孤本藏书



在最初，我们并不知道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但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去查找资料。第一个重要资料来源就是阿迪亚（Adyar）总部的图书馆。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浩瀚如海的书籍中，2012年9月，会长钟山儿先生发现了几本珍贵的中文旧书。这个发现非常鼓舞人心，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不是空白！

Dr. Wu's Works
on Theosoph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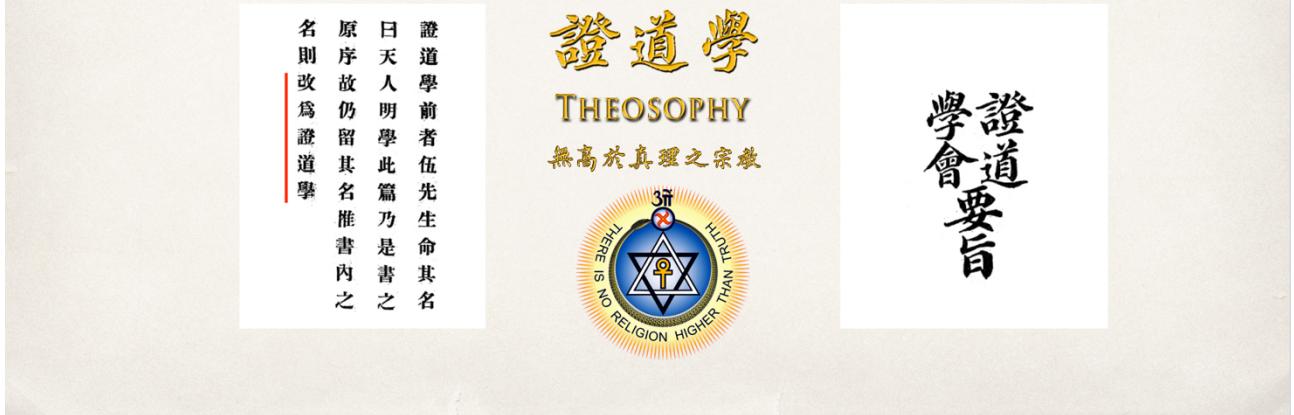
Comprising:
"Principles of Theosophy"
"Outline of Theosophy"
"Introductory Lessons on Karma" (translation)
"Introduction to Esotericism"

Published by the
China Publication Fund
2, G. Rue 960 Shanghai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中文官方翻译改为“证道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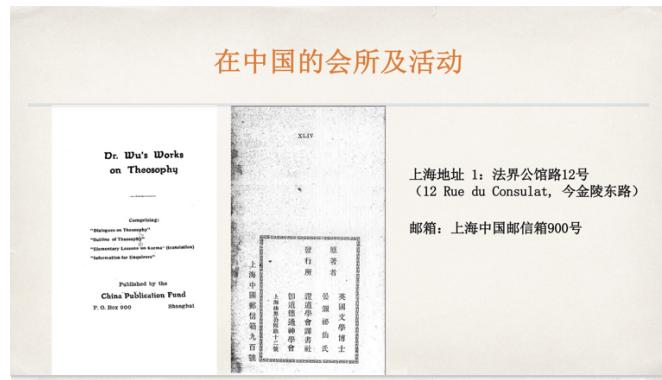
*2012年11月22日，改中文正式名称为“证道学”（曾用“天人明学”，“天人明道学”，“通神学”，“道德通神学”，“神智学”）



于是，同年11月，新加坡证道学学会决定把“Theosophy”的中文翻译正式定为“证道学”。后来找到的资料显示，“证道学”这个正式官方名称从1920年代一直使用到1970年代。我们沿用它，既是为了纪念前辈们的努力，又是出于对伍廷芳的敬重和他所用名称意义的认同，更是一种继承证道学在中华的事业的发心。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学会官网上的中文字，就是按照这些旧书上的字体设计的。链接没有断。

（伍廷芳没用“神智学”和其他名字，一是为了避免人们误解学会目的是与鬼神往来（通灵），或者与一般宗教的神佛上帝联系起来。第二是因为他认为 Theosophy 是天理和天道，证道人是将天道身体力行，自化化人。这与学会创立人布拉瓦茨基夫人提出的证道人生三个支柱“学习，冥想，服务”同出一辙。因此，“证道学”三个字，不仅可以更好地体现学子们学的是“道”（真理），而且要证得天人合一，以实际行动利益人类。我们出于对伍公的敬重，出于对他所用名称意义的认同，更是为了继承证道学在中华的传统，决定使用“证道学”，并将学会的中文名从“新加坡神智学学会”改为“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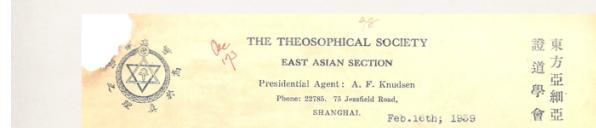
在中国的会所及活动



在中国的会所及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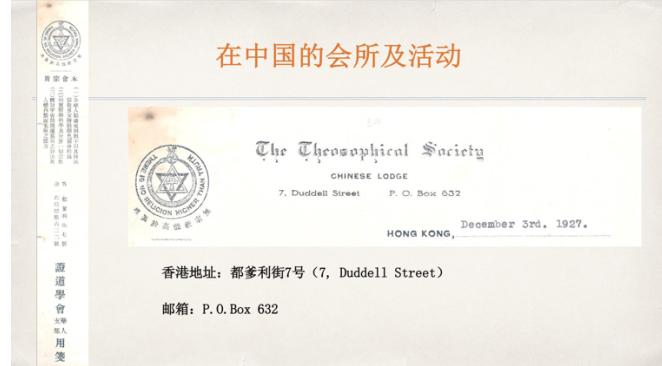
在中国的会所及活动



上海地址 3: 75 Jessfield Road (75, 极司非尔路, 今万航渡路)

证道学会东方亚细亚 总部

在中国的会所及活动



香港地址: 都爹利街7号 (7, Duddell Street)

邮箱: P. O. Box 632

这些珍贵的书籍显示了证道学学会在中国曾经活跃。不仅印书, 而且有各处会所。仅上海就起码有三个地址:

- 1) 法界公馆路 12 号 (今金陵东路),
- 2) 南京路 153 号, 今天的美伦大楼
- 3) 甚至亚洲的总部也设在上海, 在今天的万航渡路。

除此之外, 在香港也有正式会所。大家可以看到, 都统一用“证道学”这个名称。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2. 总部阿迪亚档案馆



证道学学会是一个管理有序的学会，所有的会所都需要向总部写年度活动报告。于是以书籍为线索，我们就来到第二个重要资料来源：总部的档案馆。在档案馆里，我们发现了一些关于学会在中国的活动信息，“伍廷芳”的贡献和领导者的角色更是跃然纸上。进一步的档案研究揭示，伍廷芳是这一思想体系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人物。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3. 总部阿迪亚会员登记总记录

•2025年，杜巍巍在总部阿迪亚会员登记总记录中找到在中国的会员的珍贵记录

1) 第一册/126页/5039: Alphonse Bottu | Arsenal de Kiang Nan, Shanghai (江南制造局), China | 1889年6月17日

General No.	Branch	Name	Address	Applied	Fee	Entered	Diploma	Remarks
5039		Alphonse Bottu	Arsenal de Kiang Nan, Shanghai, China					

2) 第五册/143页/63141: Krotona USA (美国克罗托纳) | Tingfang Wu (伍廷芳) | Shanghai China | 1916年8月23日

General No.	Branch	NAME	ADDRESS	National Society	Entered	Remarks
63141	Krotona	Tingfang, Wu	Shanghai, China	"	"	"

第三个重要的资料来源就是总部的会员登记总记录。这个记录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里程碑，一个宝藏。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早在 19 世纪末时，各国人士就不论国籍，种族，性别，信仰，肤色，都登记在同一个本子里。从布拉瓦茨基和阿尔科特开始，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会员。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开创先河的一个记录，非常令人感动。

由于证道学是近代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灵性思潮，对世界的深刻影响，现在许多学者，传记作家，历史学家都向学会询问，某某名人是否是学会的会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在法国学会帮助把这本记录进行数据化，便于后人查找。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两个跟中国有关的重要的名字。第一个是 Alphonse Bottu，法国人，1889 年入会，地址写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他是那里的法语和国际法教师。他的名字虽然不代表那时中国就有学会，但是很有历史背景色彩（洋务运动）

第二个名字当然就是伍廷芳。记录显示，他在 1916 年 8 月 23 日在美国加州的克罗托纳入会，地址填的是中国上海。可见证道学学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天下一家的组织。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4. 学者，各界人士及会员提供的资料

- 2013年5月24日，上海王宏超先生联系我们并提供大量宝贵历史资料
- 2013年7月11日，日本神户庄千慧女士联系我们并提供资料
- 2025年，重庆照东女士提供大量珍贵历史资料
- 2012-今：会员搜索找到的资料
- 资料库：
<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伍廷芳/



当然，光靠学会自己的历史材料，是很难看到更全更大的画面的。我们重塑证道学在中国历史的第四个重要资料来源，就是学者们，各界人士，以及会员。由于我们在2012年设立了中文网站并且改名为“证道学”，这大大便利了查找资料和联系我们。

在这里，我代表学会特别感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王宏超教授早在2013年就联系我们，并且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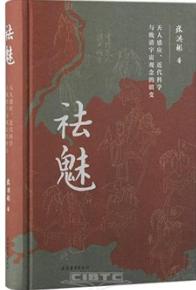
同年晚些时候，日本神户女子大学的庄千慧女士也联系了我们并且提供了资料。

2025年，重庆的照东女士也提供了大量珍贵历史资料。

学会的会员也一直在收集资料。比如，在学会档案馆里我们看到上海有“贝森特女子学校”，于是顺着这个藤，徐东泰找到了“培成女校”。这个学校是今天的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中的前身。所有这些材料，我们都收录在官网“伍廷芳”栏目中。欢迎大家继续提供资料。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5. 学者的继续研究



伍廷芳证道学研究

张洪彬

嘉宾

- 张洪彬
-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访问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 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宗教史、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近代思想史上的世界观祛魅与复魅。
- 邮箱：zhanghb@shnu.edu.cn

我们对证道学在中国历史的重塑，不局限于对历史材料的收集，还有学者们的继续研究和评论。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了两位这样的学者。

第一位嘉宾是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的张洪彬副教授。张教授是华东师大的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近，现代宗教史，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近代思想史上的世界观祛魅和复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读《祛魅》这本书。

张教授著有“伍廷芳证道学研究”的论文，我们将用“证道学世界”公众号刊载。感谢张教授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讲座并且在后面参与答疑。

重塑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学者的继续研究

主讲人

- 徐东泰 (Dante Hsu)
- 现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NU) 攻读人文与社会科学哲学荣誉学士学位 (PhB-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 主修哲学 ·
- 研究方向为中西方古典哲学、道教研究、跨文化哲学、心灵哲学 · 人工智能哲学 ·
- 邮箱 : sagessexu@outlook.com

新加坡证道学会2025年系列讲座 9



伍廷芳与证道学

从外交舞台到学术探索：中国证道学发展史

2025年12月28日

另一位学者是今天的主讲徐东泰。东泰现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攻读/人文和社会科学哲学/学士学位，主修哲学。他的研究方向是中西方古典哲学，道教，跨文化哲学，心灵哲学和人工智能哲学。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查找大量资料，精心整理并制作了今天的讲座。非常感谢你的努力和用心。

好，我的介绍就到这里，有请东泰开讲。



證道學

THEOSOPHY

無高於真理之宗教



伍廷芳与证道学

从外交舞台到灵学探索：中国证道学发展史

2025年12月28日

第一部分

各位晚上好。感谢巍巍老师的介绍，欢迎张教授，也欢迎在座的每一位来此聆听的朋友。在分享前，我先作几点简要说明。

我的背景并非历史学的专业研究，今天所讲的内容只是站立在无数前辈学者耕耘的学术沃土之上，进行的一次个人的学习汇报与分享。我们都深知，历史的面貌，尤其依赖于史料的確证与解读，而这个过程本身便充满了挑战。对于伍廷芳先生与证道学这段百年之前的因缘，我所能做的也仅是在现有材料的指引下，尽力拼合一个我认为相对合理的故事版本，其中必然会染上我个人视角的色泽也会存在许多有待商榷的空间，若在讲述中有任何失当或值得深入探讨之处，我期待各位能在讲座后给予指正。

目录

- ❖ 伍廷芳生平
- ❖ 证道学在中国
- ❖ 伍廷芳的精神世界
- ❖ 评议与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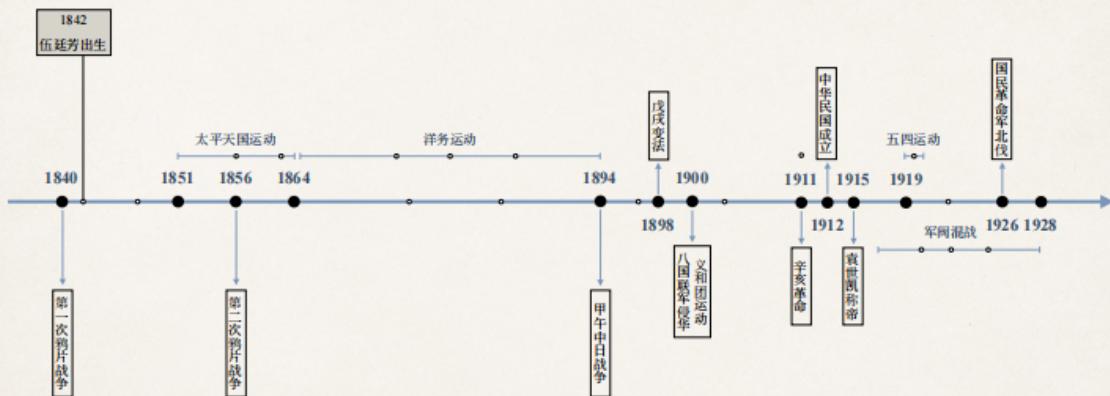


今天讲座的内容，共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伍廷芳生平；第二部分，证道学在中国；第三部分，伍廷芳的精神世界；第四部分，评议与重思，在之后我们会提供部分问答时间。

伍廷芳生平

现在，让我们首先走进第一部分：伍廷芳生平



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理解伍廷芳所处的历史背景，我梳理出了一条重大事件时间线。大家请看，伍廷芳的一生，恰好横跨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变动最剧烈的数十年——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到五四运动的思潮，他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家世与出生（0~2岁）



伍氏合族总谱



伍子胥画像



伍秉鑑

据《岭南伍氏总谱》记载，伍廷芳家族的始祖为春秋楚国大夫伍参，官至左大夫加上大夫，伍廷芳是其第七十二世孙。历史上，伍参曾以关键谏言影响楚庄王争霸中原，其子伍举、孙伍奢亦为楚国重臣。其曾孙伍子胥更以扶助吴国、成就霸业的传奇经历，成为家族史上不朽的标志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伍氏家族在清代亦人才辈出。与伍廷芳同时代且同宗的广州十三行巨商伍秉鑑，便是其近代家族声望的杰出代表。二者共同展现了伍氏家族源远流长且多元显赫的历史传承。



宋上柱国伍公祠

楚亡后，伍氏家族在中原地区历经漫长播迁。伍氏定居岭南，始于南宋初年的伍娘（又写作伍娘，字国宾，号毓圣）。他是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辛丑科进士，位列二甲第五名，后在宋高宗建炎年间官至特进「光禄大夫、平章使」，受封「上柱国」。后因在随从皇帝祭祀时进言讨论阴阳灾异与人事得失，触怒皇帝，被贬为「岭南将军」，镇守南恩州（今广东恩平一带），最终在任上去世。当时中原战乱频仍，水路不通，其夫人麦氏便带着其两儿，迁至广州府新宁县（今台山市）文章都斗洞乡定居。伍娘因此被尊为岭南斗洞伍氏的一世祖。为纪念这位宋代先祖，族人相传于宋代始建「上柱国伍公祠」，数百年来香火绵延不绝。

现在，就让我们从一切的起点开始，回到19世纪中叶，看看伍廷芳是如何诞生的。

伍廷芳出身于岭南伍氏家族，这是一个非常古老、支脉庞大的中国宗族。这个家族的传奇要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讲起。他们的始祖是楚国大夫伍参，伍廷芳正是这位伍参的第72代世孙。家族的历史星光熠熠：伍参的曾孙便是那位鼎鼎大名、辅助吴王成就霸业的伍子胥。楚亡后，伍氏在中原历经漫长播迁，直到南宋时，祖先伍娘考中进士、官至高位，却因直言进谏被贬至广东，从此家族在岭南扎下根基。伍娘被尊为开基始祖，后人修建的宋上柱国伍公祠至今香火鼎盛。时光流转到清朝，这个家族依然英才辈出。与伍廷芳同时代，同宗的伍秉鑑已是广州十三行的首席商人，被西方称为“世界首富”，更在2000年的《华尔街日报》评选的千年全球最富五十人中占有一席。可见，深厚显赫的家世传统，早已为伍廷芳的人生埋下了不凡的伏笔。



描绘中国劳工在新加坡码头卸货的场景，这幅画创作于1873年
图片来自《London News》收藏集，由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伍廷芳出生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一个典型的华侨商人家庭，其有多个称呼，其中原名伍叙（Ng Achoy）为父亲所起，又名伍才，字文爵，号秩庸。其两个哥哥，分别是长兄伍发（Ng Afat），次兄伍光（Ng Afwong）。伍廷芳的父亲伍荣彰（社常，Ng Achoon），早年远赴南洋谋生，最终在新加坡经营商业，成为同时代少数成功积累财富的华侨。其母余娜（Lean Neo）是一位笃信基督教的广东客家女子，常于新加坡的纪魄礼马来礼拜堂（Mr.Kearberrys' Malay Chapel）活动。当时，绝大多数远赴新加坡的华工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大多来自闽粤沿海，以契约劳工身份在种植园、码头、矿山从事重体力劳动，环境恶劣，报酬微薄，十人中仅一二人能在数年后攒够返乡路费。



然而，伍廷芳的起点却不在岭南祖地。他出生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的新加坡，一个典型的华侨商人家庭。父亲伍荣彰早年远渡南洋谋生，经过奋斗成为当地少数成功的华商；母亲余娜是位笃信基督教的广东客家女子，常在新加坡的纪魄礼马来礼拜堂活动。家中兄弟三人，伍廷芳原名伍叙，又名伍才，字文爵，号秩庸，两个哥哥，分别是伍光和伍发。当时的新加坡，绝大多数华工生活在极度贫困之中。他们多来自闽粤沿海，以契约劳工身份在种植园、码头、矿山从事重体力劳动，环境恶劣，报酬微薄，十人中仅一二人能在数年后攒够返乡路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伍廷芳的家族能够站稳脚跟、积累财富，已属极为不易。

学生时代(3~19岁)



广州私塾

伍廷芳三四岁时随父亲回广州芳村定居，在广州私塾，研读四书五经。（* 图中为广州一所私塾，照片中坐着老师和一群学生们。学生们衣着简陋，赤脚，应来自贫苦家庭。摄于1863年。）

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岭南，社会动荡，匪患猖獗。时年十三岁的伍廷芳虽非豪门子弟，但在当地小股土匪眼中，其经商返粤的家庭仍属「有利可图」，因而不幸成为绑票目标。据伍廷芳晚年回忆，他被土匪蒙眼挟持，跋涉于山路小河之间，最终被囚禁于一个深山岩洞长达月余。匪徒向其家人索要赎金。在困守期间，他侥幸得到一位自称同样被掳、在洞中充当伙夫的同乡救助。这位同乡利用酒肉灌醉看守，二人一同冒险逃脱匪窟。



圣保罗书院 (St. Paul's College)

十四岁时在亲戚陈言陪同下以伍才之名往香港求学，在圣保罗书院 (St. Paul's College) 就读。（* 美国布里斯托大学 Robert Bickers 教授领导的《中国历史照片》项目照片，编号NA20-14，摄于1897年）

现在，让我们进入伍廷芳的学生年代

伍廷芳三四岁时随父亲回到广州芳村定居，进入私塾，开始研读四书五经。他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但对科举八股却兴趣索然，常常一看功课便昏昏欲睡，反倒热衷于阅读诸子百家与史书。他曾叹息道：“中国人才，尽锢蔽于此矣。”——一种不拘于传统、心怀天下的性格，在少年时代便已显露。然而，时代的剧变打断了他的书斋生活。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岭南，社会陷入剧烈动荡，盗匪横行。家境尚可的伍家也成为目标。大约十三岁时，伍廷芳不幸被土匪绑架，囚禁于深山岩洞长达一个多月。在匪巢中，这位少年展现出超乎年龄的镇定与智慧。他暗中得到一位在洞中充当伙夫的同乡帮助，二人伺机用酒灌醉看守，冒险一同逃脱了匪窟。

这次历险后，动荡的社会已无法让他安心求学，家人出于安全考虑，安排他中断私塾学业，进入福音堂拜晏惠林为师，专习英语半年。晏牧师见他聪慧勤勉、倾心西学，便亲自推荐他赴港深造。1851年，年仅十四岁的伍廷芳在亲戚陈言的陪同下，以“伍才”之名赴香港，进入圣保罗书院就读。这成为他人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从传统中国的私塾，走向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学堂。

圣保罗书院成立于1843年，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学校免学费并提供补助，旨在培养本地传教士。但伍廷芳后来坦言，他入读的主要目的是提高英语水平，为将来在香港这个中西交汇的社会谋取出路。在书院里，他系统学习英文、数学、科学等西式科目。对于厌恶八股文却天资聪颖的他来说，这里提供了真正感兴趣的知识天地。1861年，伍廷芳以优异成绩毕业，这为他日后成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外交与法制改革家，奠定了重要的知识和视野基础。

参与创办中文报纸（19~32岁）



香港中外新報

1857年，英文《孖剌西報 (Hong Kong Daily Press)》创办中文附刊《香港船头货价纸》，尚在圣保罗书院求学的伍廷芳已开始为该报从事编译工作。1864年，其兄伍光接手该报并将其改造为《中外新報》，确立了近代中文报纸的雏形。此后近三十年，该报由伍氏家族主导经营，先后由伍光及其堂弟伍臣主持。已任职香港司法系统的伍廷芳虽公务繁重，仍持续以编译外电、翻译文稿等方式支持这份家族事业。



陈言 (Chun Ayin)



华字日报

与此同时，那位将他引入圣保罗书院的亲戚陈言（萬亭）也开启了报业实践。陈言早年也毕业于圣保罗书院，后即在香港裁判处任通事（译员）。在担任《德臣西報 (The China Mail)》副主笔期间，深刻认识到“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遂于1871年在伍廷芳、何启等亲友支持下，以该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中外新闻七日报》，次年独立发行为《香港华字日报》。该报后发展为香港近代中文报业的重要代表。

现在，我们来到伍廷芳的青年时期

在圣保罗书院就读期间，伍廷芳的求知之路并未局限于课堂。当时，书院位于香港中环，与云咸街的《孖剌西報》报馆仅一街之隔。1857年，这份英文报纸创办了中文附刊《香港船头货价纸》，而年轻的伍廷芳便利用课余时间，开始为这份报刊从事编译工作，这成为他接触新闻与翻译的最初实践。1864年，他的兄长伍光接手该报，并将其改造为著名的《中外新報》，确立了近代中文报纸的雏形。此后近三十年，这份报纸主要由伍氏家族经营，先后由伍光及其堂弟伍臣主持。即便后来伍廷芳已进入香港司法系统担任公职，事务繁忙，他仍持续通过编译外电、翻译文稿等方式，支持着这份事业。

与此同时，那位曾引领他进入圣保罗书院的亲戚陈言，也在报业领域展开了重要实践。陈言早年同样毕业于圣保罗书院，曾任职于香港裁判处担任通事（译员）。在担任《德臣西報》副主笔期间，他深刻认识到“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遂于1871年在伍廷芳、何启等亲友的支持下，以该报中文版名义创办《中外新闻七日报》，次年独立发行为《香港华字日报》。该报后来发展成为香港近代中文报业的重要代表。这段编译报纸的经历，不仅锻炼了伍廷芳的中英双语能力和信息处理技巧，也为他日后在沟通中西、参与公共事务方面积累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法院译员与联姻（20~32岁）



姐姐 何妙龄



何进善 (福堂)



弟弟 何启

何进善为广东南海人，早年赴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1843年随该校迁至香港，后被伦敦传道会按立为继梁发之后的第二位华人牧师。他于1863年在香港设立伦敦传道会福音堂，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神学家」，并曾协助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重要贡献。何氏在香港亦参与地产经营，家境丰裕。其子何启（1859-1914）后成为香港执业大律师、立法局议员，并创办雅丽氏医院及香港西医书院，是香港近代化进程中的关键人物。



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

伍廷芳在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于1862年出任香港高等法院译员。1864年，他与何进善的长女何妙龄结婚，时年22岁，何氏17岁。1865年，伍廷芳调任巡理厅首席译员。公余时间，他还曾为胡礼垣补习英文。与何氏家族的联姻，使伍廷芳得以进入一个兼具中西学识、社会声望与经济实力的精英网络。这种联系不仅提升了他在香港华人社会中的地位，更使其深入接触到西方制度与文化，为其后来毅然放弃稳定职业、自费赴英攻读法学的抉择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圣保罗书院毕业后，伍廷芳于 1862 年进入香港高等法院担任译员，开启了职业生涯。两年后，他迎来了人生中另一个重要节点——与何进善的长女、何启的姐姐何妙龄成婚。这场婚姻不仅缔结了家庭的纽带，更将伍廷芳引入了一个兼具中西学识、社会声望与经济实力的精英网络。

何氏家族在当时香港社会颇具影响力。何进善早年曾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后成为伦敦传道会继梁发之后的第二位华人牧师，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位神学家”。他不仅协助汉学家理雅各翻译中国经典，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也在香港参与地产经营，家境殷实。其子何启后来更成为香港执业大律师、立法局议员，并创办雅丽氏医院及香港西医书院，是推动香港近代化的关键人物。

伍廷芳的事业也伴随着婚姻也开始稳步发展。1865年，伍廷芳调任巡理厅首席译员。即便在公务之余，他仍不忘治学，他曾在这段期间利用闲暇时间为后来的著名思想家胡礼垣补习英文。这一时期的经历，既展现了伍廷芳扎实的学识与勤勉的品格，也反映了他始终身处在一个致力于沟通中西、推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圈层之中。

留学英国(32~34岁)



林肯律师会馆 (Lincoln's Inn)



会馆大堂



郭嵩焘



刘锡鸿

1874年，时年三十三岁的伍廷芳深感欲救国家危难，必须远赴欧美精研法学，以改革国内不合时宜的典章制度。为此，他毅然放弃已担任四年、且以勤勉著称的巡理署译员一职，以十年节俭积蓄为资，携妻子共同赴英留学。他进入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历史可追溯至中古后期、当时仍保留浓厚贵族传统且最受重视的林肯律师会馆学习法律。（图片皆来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出版的《Wonderful London》）。根据该学院严格规定，学生必须在院内住校攻读整整3年十二个学期，并在学院餐厅完成规定次数的晚餐，方能毕业。这段经历不仅使他接受了系统、完整的西方法律教育，也让他得以融入上流社会的社交网络，与精英人士建立友谊与合作关系。

1877年，刚获英国大律师资格的伍廷芳在伦敦拜会了当时的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他见解精辟、风度出众，郭氏深感其才，当日两次派人挽留，欲聘为翻译或随员。但伍廷芳因已有首任清朝驻美公使陈兰彬对其邀请的赴美之约，且认为使团薪资远不及律师收入与社会地位，故婉拒而去。郭嵩焘惜才心切，事后专折上奏，力陈其“通语言、谙律例”，终使朝廷破格授予其三等参赞官衔。此事亦引起北洋大臣李鸿章关注，他致信郭嵩焘，对未能留住伍廷芳表示惋惜。

但伍廷芳没有止步于此，或许是何氏家族的影响，或是自己的期盼，使得他做出了又一个重大的决定。

时间来到1874年，三十三岁的伍廷芳深感欲救国家危难，必须远渡重洋，到现代法学的发源地——英国——去深入学习。为此，他毅然放弃了在香港已担任四年、且以勤勉著称的巡理厅首席译员这一稳定职位，拿出自己十余年节俭所积攒的积蓄，在妻子的支持下，携妻子何妙龄一同踏上了赴英留学的道路。他进入了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林肯律师会馆学习。这是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中古时期，保留了深厚的贵族传统。根据学院的严格规定，学生必须在院内住校攻读整整3年十二个学期，并且需在学院的餐厅完成规定次数的正式晚餐，方可毕业。这段艰辛而纯粹的求学生涯，不仅使他接受了系统、完整的西方法律教育，也让他得以融入英国上流社会的社交网络，与诸多精英人士建立了宝贵的友谊。

1877年1月，刚获得英国大律师资格的伍廷芳，在伦敦拜会了当时的清朝驻英公使郭嵩焘。在这次会面中，伍廷芳以精辟的见解和出众的风度，给郭嵩焘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求贤若渴的郭公使在当日竟两次派人挽留，希望聘请他担任使团的翻译或随员。然而，伍廷芳因为此前已接受了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的赴美邀请，且深知外交使团的薪酬与社会地位，远不及一位执业大律师的前景，故而婉言谢绝，径自离去。郭嵩焘惜才心切，事后专程上奏朝廷，极力称赞伍廷芳“通语言、谙律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此事甚至引起了远在北洋的李鸿章的关注，他特意致信郭嵩焘，也对未能留住伍廷芳表示惋惜。

香港大律师及其他职务 (35~38岁)



时为香港大律师的伍廷芳



轩尼诗
(John Pope Hennessy)



1896年保良局新局址开幕照片

◆ 1877年前后，伍廷芳在香港完成了从「获得律师资格的专业人士」向「华人公共事务与政治代表人物」的转变。轩尼诗爵士出任港督后，推行以种族平等与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司法改革，废除公开笞刑与残酷体罚。这一改革触动了部分在港英人的既得观念，引发强烈反弹。伍廷芳与梁安等华人领袖明确站在改革一方，代表华人社会公开支持轩尼诗。1878年，在反对改革的英人召开民众大会时，伍廷芳率华人代表出席，要求大会提供中文传译与基本知情权。遭拒后，他当场带领华人退场抗议，并通过公开信谴责大会对华人的制度性歧视。其后，华人社会在其参与与推动下两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轩尼诗留任，显示出华人群体已开始以有组织、有策略的方式介入殖民政治。

◆ 与此同时，伍廷芳也深度参与社会改革实践。针对香港长期存在的拐卖妇女儿童问题，他与轩尼诗合作，推动成立保良局，并被委任为副主席。伍廷芳在处理「拐卖」与华人家庭收养婢女的界线问题上，主张区分犯罪行为与社会习俗，强调法律应避免对华人社会造成不当伤害。保良局由此在缉拿拐犯、收容保护受害者与缓和中英法律冲突之间发挥了关键作用。1878年，他被轩尼诗委任为香港首位华人太平绅士，象征华人首次以制度化身份参与司法秩序。1880年，在华人社会联名请愿与轩尼诗力荐下，伍廷芳获临时委任为立法局议员，成为首位进入香港立法机构的华人代表。

在 1877 年获得大律师资格后，伍廷芳依然回到香港就职大律师，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伍廷芳在香港的身份开始发生转变——他从一位专业法律人士，逐渐成为华人社会在公共事务与政治领域的代表人物。这一转变，与当时的香港总督轩尼诗爵士推行的司法改革密切相关。轩尼诗上任后，致力于推动以种族平等和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改革，例如废除公开笞刑等残酷体罚。这些举措虽然进步，却触动了部分在港英人的传统观念与既得利益，引发了强烈反弹。在这场舆论与政治的角力中，伍廷芳等华人领袖坚定地站在了改革一方，公开代表华人社会支持轩尼诗。1878 年，当反对改革的英人召开民众大会时，伍廷芳率领华人代表出席，并要求大会提供中文传译、保障华人的知情权。在诉求被拒绝后，他当场带领华人代表退席抗议，并通过公开信强烈谴责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此后，华人社会更在其参与推动下，两次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让轩尼诗留任。这一系列行动标志着香港华人开始以有组织、有策略的方式，积极介入殖民地的政治进程。

与此同时，伍廷芳也深度参与具体的社会改革实践。针对香港长期存在的拐卖妇女儿童这一严重社会问题，他与轩尼诗密切合作，推动成立了保良局，并被委任为副主席。在处理“拐卖”与华人社会传统中收养婢女的复杂界线时，他主张法律应区分犯罪行为与社会习俗，强调执法需谨慎，避免对华人社会造成不必要的伤害。保良局因此成功地在缉拿罪犯、保护受害者与缓和不同法律文化冲突之间，发挥了关键的缓冲与桥梁作用。

北上幕僚(40~53岁)



天津直隶总督衙门 李鸿章办公处



李鸿章

1877年，伍廷芳应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之邀赴天津，这是他首次正式进入清廷高层视野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在会晤伍廷芳后，对其西方法律素养与人格气质表现出高度评价与倚重。他于十月上函总理衙门，请求正式任用伍廷芳，明确指出当时中外交涉日益繁重，而中国屡在外交案件中受制于人，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通晓西方法律与国际公法的人才。李认为，单以中国律例处理涉外案件，往往遭西方国家拒不接受；唯有“以彼之矛，刺彼之盾”方能在外交与通商争端中据理力争。

在函中，李鸿章系统阐述了任用伍廷芳的三重理由：

- 第一，伍廷芳精通英美法律与国际公法，能直接参与与西方外交官、领事的法律辩论；
- 第二，他虽久居海外，却“恂恂有儒士风，绝无外洋习气”，既通西学又守中国传统士人伦理，极为难得；
- 第三，伍廷芳为中国人，较雇用高薪外国律师（如日本外务省雇用前美驻津领事施博）更具政治与制度弹性，也更有利于长远培养本国涉外法律能力。

李鸿章进一步设想，伍廷芳除担任法律顾问、处理南北洋涉外疑难案件外，还可负责翻译英美律例与国际公法，为清廷拟订《通商则例》提供制度与文本基础。这一构想，与当时出使英美大臣郭嵩焘倡议编纂通商法规、建立中外交涉统一依据的努力相互呼应。在总理衙门批准后，伍廷芳被正式留任北洋系统，年薪六千两，由南北洋分摊，成为清政府首位不经科举、以西方法律专长进入中级官僚体系的中国人。这一任命不仅突破了传统仕途路径，也使伍廷芳得以直接参与洋务运动与近代外交制度建设，成为清廷“以法律应对帝国主义压力”的关键人物。

尽管伍廷芳在北洋担任法律顾问的时间不长，因父丧遵制南归，但此次入仕已为其后续政治生涯奠定基础。至光绪八年（1882年）再入京城时，他已被视为处理中外交涉与制度改革的重要人选。这次1877年的天津之行，构成伍廷芳由殖民地律师转化为清末外交一法政改革核心人物的决定性起点。

而其实1877年10月，才在香港就任大律师短短7个月的伍廷芳就收到了来自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的邀请，赴天津会面。于是，在忙完一系列事情后，他于10月前往天津，这次会面，成为他正式进入清廷高层视野、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关键时刻。李鸿章在与伍廷芳深入交谈后，对其卓越的西方法律素养和沉稳得体的个人气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决意要倚重这位人才。当年十月，李鸿章便正式致函总理衙门，恳请朝廷任用伍廷芳。他在信中深刻地指出，随着中外交涉日益频繁，中国在各类外交与司法案件中屡屡受制于西方，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精通西方法律与国际公法的人才。李鸿章认为，如果只用中国传统的律例去处理涉外案件，往往被西方国家拒绝承认；唯有“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运用西方的法律知识据理力争，才能有效维护国家权益。

在奏函中，李鸿章系统地阐述了任用伍廷芳的三重理由：

第一，专业能力过硬。伍廷芳精通英美法律与国际公法，足以直接与西方外交官、领事进行法律辩论。

第二，第二，品行气质可贵。他虽然久居海外，却“恂恂有儒士风，绝无外洋习气”，既通晓西学，又保持了传统中国士人的风骨与伦理，这样的结合极为难得。

第三，第三，身份优势明显。作为中国人，任用他远比高薪聘请外国律师（如日本外务省雇用的美国前领事）更具政治与制度的灵活性，也更有利于清廷长远地培养自己的涉外法律人才。

李鸿章还进一步规划了伍廷芳的角色：他不仅可以担任法律顾问，处理南北洋的疑难涉外案件，还能负责翻译英美律例与国际公法，为清廷未来拟订《通商则例》提供坚实的制度与文本基础。这一构想，也与当时郭嵩焘等有识之士呼吁编纂通商法规、建立统一外交法理依据的努力遥相呼应。

在获得总理衙门批准后，伍廷芳被正式留任于北洋系统，年薪六千两，由南北洋共同分摊。他由此成为清政府首位不经过科举正途，而是凭借西方法律专业能力进入中级官僚体系的中国人。这项突破性的任命，不仅为他个人开辟了一条崭新的仕途，也使他得以直接参与

洋务运动与近代外交的制度建设，成为清廷试图“运用法律应对帝国主义压力”的关键人物。

尽管后来伍廷芳因父亲去世，需按制回乡守丧，于 1878 年重返香港做回了大律师，在北洋担任法律顾问的时间不算长，但这次成功的入仕，已为他后续的政治生涯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兴建铁路与马关条约(40~53岁)



李鸿章及其随从站在天津火车站的敞篷货车上

在李鸿章主持铁路事务期间，清政府任命伍廷芳为中国铁路公司总经理，统筹全国铁路建设。他延聘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主张以中国人才负责技术与工程，减少对外国顾问的依赖。李鸿章、伍廷芳与詹天佑的合作，推动了清末铁路事业的制度化与本土化，象征着中国在近代交通领域追求自强的努力。（* 图片源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下关和平会议绘图》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清军在陆海战中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次年初，清廷被迫议和，任命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代表出使日本。伍廷芳以随员兼法律顾问随行。1895年3月，两人抵达日本广岛，与日方就领土、赔款等问题谈判。伍廷芳精通外交与国际法，协助起草文件，多次据理辩护，力求减轻割地赔款。4月《马关条约》签订，中国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并赔银二亿两。这次经历使伍廷芳深切感受到国家积弱之痛，坚定了他日后推动法制改革与国家自强的信念。（* 永地秀太作。展于日本东京明治纪念馆。右边中间身着蓝衣之人即为伍廷芳）

到了 1882 年他再次奉召进京时，伍廷芳已然被视为朝廷处理中外交涉与推进制度改革的核心人选，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

他很快就在李鸿章主导的洋务事业中承担起更具体的职责。在李鸿章主持全国铁路事务期间，清政府任命伍廷芳为中国铁路公司的总经理，负责统筹规划铁路建设。在这一职位上，他展现了前瞻性的眼光，不仅延聘了后来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詹天佑担任总工程师，更明确提出应以中国人才为核心，负责关键技术与工程，以减少对外国顾问的过度依赖。李鸿章、伍廷芳与詹天佑的这次合作，堪称典范，它推动了清末铁路事业走向制度化和本土化，是近代中国在交通领域追求自强的一个生动缩影。

然而，国家的命运并非一帆风顺。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清朝在陆海战中遭遇惨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场失败将中国推向了更深的危机。次年，清廷被迫派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本议和，伍廷芳以随员兼法律顾问的身份同行。1895 年 3 月，代表团抵达日本广岛，与日方就割地、赔款等苛刻条款展开艰难谈判。伍廷芳凭借其精湛的外交技巧与国际法知识，协助起草文件，在谈判桌上多次据理力争，试图为苦难的国家减轻损失。然而，弱国无外交，最终《马关条约》被迫签订，中国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赔偿白银二亿两。

这次马关议和的屈辱经历，让伍廷芳与李鸿章等有识之士痛切地认识到，国家的失败远不止于战场，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制度落后与人才匮乏。就在《马关条约》签订、举国痛定思痛之际，一场以兴学育才为核心的“自强”浪潮迅速兴起。甲午战败后，兴办新式学堂成为朝野上下的强烈共识。在这一背景下，筹办新式学堂的具体重任，由直隶总督王文韶推动，并责成津海关道、洋务实干家盛宣怀全力承担。

北洋西学学堂总办（53岁）



盛宣怀



王文韶



北洋大学堂校址照片

◆ 清末「北洋西学堂」的创办始于1895年甲午战败后的民族自强浪潮。在光绪皇帝「力行实政」的上谕号召下，直隶总督王文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八月十二日上奏，奏请设立「北洋西学堂」，由津海关道盛宣怀具体筹办并倡议捐资。同年八月十四日（公历10月2日），光绪皇帝批准，标志着中国第一所近代大学正式诞生。学堂分头等学堂（大学本科）和二等学堂（预科），由伍廷芳、蔡绍基分任总办，并聘请美国人丁家立为总教习，仿照西方学制开设工程、矿治、律例等学科。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一度中断，后于1903年在西沽武库旧址复校，并更名为北洋大学堂，奠定了天津大学的百年基业。

在光绪皇帝“力行实政”的号召下，1895年，直隶总督王文韶上奏，请求设立“北洋西学学堂”，以培养通晓西学、务实救国的新型人才。这一奏请迅速得到批准。同年10月2日，由盛宣怀具体筹办并倡议捐资的北洋西学学堂正式成立，这被视为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大学。

学堂分为头等学堂（大学本科）和二等学堂（预科），旨在系统传授西方科学与法学知识。盛宣怀邀请伍廷芳为头等学堂总办，并聘请美国教育家丁家立为总教习，仿照西方学制，开设工程、矿治、法律等实用学科。这项任命意义深远——它意味着，甲午战败后，清廷中有远见的官员将培养未来人才的希望，部分寄托在了像伍廷芳这样既熟悉西方法政、又具备改革意识的精英身上。尽管学堂在1900年因八国联军侵华而一度停办，但1903年在西沽武库旧址复校，并更名为北洋大学堂，由此奠定了天津大学延续至今的百年基业。

外交生涯与清法修订（54~68岁）



新任中国部长抵达华盛顿途中

◆ 伍廷芳与妻子及儿子伍秩廉在西方酒店的客厅内合影。照片拍摄于他前往华盛顿途中，刚刚就任中国外交部长之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提供）



托马斯·富兰克林·施耐德的豪宅 (Schneider Mansion)

◆ 1891年建于华盛顿Q街1764号，由建筑师托马斯·富兰克林·施耐德设计，1896-1902年期间为伍廷芳公使的官邸兼中国使馆所在地。建筑属罗马复兴风格，后改作女子学校与公寓，1968年拆除，现为杜邦东公寓旧址。（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提供）



◆ 伍廷芳时任中国外交官兼驻美公使，摄于1900年中国义和团运动期间的华盛顿特区。伍廷芳右手边的美国参议员朱利叶斯·凯撒·伯罗斯 (Julius Caesar Burrows) 先生，面前的则是他的儿子伍朝枢（此图是《国王》刊载插图，该刊为世界新闻图鉴「乔治·纽恩斯有限公司，伦敦，1900年8月4日」）。

然而，伍廷芳担任学堂总办未及一年，朝廷便因另一项更为紧迫的需要，将他紧急调离。

视角转至大洋彼岸，自 1882 年美国通过《排华法案》起，一片系统性的阴云便长久笼罩在美华人社群之上。该法案不仅是美国历史上首部针对特定族裔的移民禁令，更标志着一种基于种族偏见与经济恐慌的国家政策被正式确立。它根植于美国西部劳工的经济焦虑、社会弥漫的“黄祸”恐惧，以及政治上的短期操弄。在这一法律框架下，华人被禁止入境、不得归化入籍，司法与社会地位沦为二等，权益屡遭践踏，排华暴力事件时有发生。而积弱的晚清政府，虽经外交途径屡次抗议，却始终难以撼动这一不公局面。面对如此严峻且复杂的侨民保护危机，清廷在甲午战败后的困局之中，做出了一项极具针对性的破格任命。1896 年底，精通英美法律、持有英国大律师资格，且深谙西方社会规则的伍廷芳，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这项任命的核心使命十分明确：朝廷需要的不仅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外交官，更是一位能在美国法律与舆论的双重战场上，直面《排华法案》所造成的系统性不公，并运用其专业学识为同胞权益进行有力辩护的“出庭律师”与“公共代言人”。

因此，当 1897 年 5 月伍廷芳在华盛顿正式履职时，他所踏入的远非寻常的外交场合。他正面遭遇的，是由法案所合法化与煽动起来的整体性排华社会情绪。他的工作，从一开始就必须超越公文往来。一方面，他以法学家的缜密，在法律条文与案例中寻找漏洞与依据，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严谨抗辩，力图在司法框架内争取微小但坚实的公正。另一方面，他毅然走向美国社会的台前，成为一名不知疲倦的公共演说家与文化阐释者。他奔走于大学、商会、教会与媒体之间，用流畅的英语与雄辩的逻辑，向美国公众阐述真实的中华文明，驳斥那些将华人“非人化”的偏见谣言，试图从观念的根源上消解敌意。



伍廷芳访问芝加哥大学画像

伍廷芳在担任中国驻美公使的首个任期内，于1900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此时正值他在美国声望与人气达到顶峰之际。1900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他受邀前往该校发表演说。此次访问期间，他获颁荣誉学位。演讲题为《美国与东方的恰当关系》，伍廷芳借此向美国听众阐释中国文化与历史——这正是他担任大使期间常履行的职责。他在美期间广受民众爱戴，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机构纷纷致以崇高礼遇。该学位旨在表彰其外交成就及弥合中美文化鸿沟的努力。典礼上校方不仅称赞伍廷芳是中国政府的代表，更盛赞这位「外国宾客」以「令人瞩目的典范展现了对我国的友好情谊」。

伍廷芳于1901年获芝加哥大学授予第二个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当时他正担任钦差驻美公使。他访问芝加哥及该校引发媒体广泛关注。1901年3月19日，伍廷芳在该校斯图德贝克剧院发表毕业典礼演讲，与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对谈中探讨中西文明问题，演讲聚焦中国文明。他指出尽管中国文明与西方文化存在差异，但其精妙程度毫不逊色。此次访问及演讲被《纽约时报》等主流报刊广泛报道，标题如《伍公使在芝加哥》。在芝加哥的三天停留期间，校方为其举办了多场招待会与晚宴。这位以魅力与机智著称的公众人物吸引了大批民众。尽管芝加哥大学后来制定了「除非满足严格学术要求，否则不授予外交官荣誉学位」的政策，但伍廷芳获奖时，此类荣誉授予知名人士尚属常态。该奖项旨在表彰他的法律成就，特别是作为首位在英国取得律师资格的华裔律师所开创的先河。

1900年2月，他在华盛顿诞辰日受邀至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演说，并获得该校颁发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校方赞誉他不仅是中国的代表，更是一位“以令人瞩目的典范展现对我国友好情谊”的宾客。紧接着在1901年3月，芝加哥大学也授予他第二个荣誉法学博士。他在演讲中充满自信地论述中西文明，强调中国文明的精神高度毫不逊色，经《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



疑似1900年12月纽约道德文化社《孔子的学说》演说现场



伍廷芳肖像
1900年11月17日「竖琴师周报」刊



本季最受欢迎的餐后演讲嘉宾之一：
伍廷芳在纽约商业聚会上的演讲
《哈波斯周刊》(Harper's Weekly)》，1900年

伍廷芳在美期间必须时刻为华人利益奔走。正如这份1902年1月的《夏威夷晚报》所载，他亲自前往美国参议院移民委员会听证会，直面反对《排华法案》。他的抗辩，是那个时代海外华人权益最重要的外交盾牌。1902年，因其卓越的法学素养，清廷一纸诏令又将其召回，任命他与沈家本同为法律修订大臣。他将在美国积累的现代法治理念带回国内，主持编纂《大清新编法典》，力主废除酷刑、起草诉讼律，为中国法制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然而，他的外交使命远未结束。1907年，他再次奉命出使美国。此时的他，声望更隆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0002629.tif

伍廷芳在伊利诺伊大学大门台阶的个人照

◆ 1908年，伍廷芳应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Edmund D. James）之邀，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中美为何应为友邦》的演讲，强调两国相互尊重的重要性。同时获伊利诺伊大学授予的第三个荣誉博士学位。报纸报道描述了他出席典礼时留下的深刻印象，当校长埃德蒙·詹姆斯介绍他登场时和演讲结束后他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演讲本身也广受好评。他指出：「思想与理想的相互交流，汲取彼此最卓越的精华，终将孕育出崭新的文明——太平洋文明……文明史册将翻开新篇章，东西方摒弃一切敌意与偏见，不再比拼武力成就，而竞逐和平胜利；唯在传播真理与光明时勇往直前，唯在确立正义与公理时坚韧不拔。」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0001275.tif

伍廷芳受邀担任伊利诺伊大学（UI）毕业典礼主讲嘉宾并访问该校（1908年6月10日）

◆ 前排左起为：校董会主席 W.A. Abbott 夫妇、伍廷芳、Alexander 夫人、校长 James、院长 David Kinley；后排右起为：Clark 院长、工程学院院长 Goss、农学院院长 Davenport、动物学教授 Forbes、副校长 Burnell、文理学院院长 Greene 及其母亲、女院长 Collock、法学院院长 Harker 和理学院院长 Townsend。

1908年6月，他应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之邀，在毕业典礼上发表题为《中美为何应为友邦》的主旨演讲。他充满远见地提出“东西方摒弃敌意”，“思想交流将孕育崭新的太平洋文明”。演讲获得雷鸣般的掌声，并获颁该校的荣誉博士学位。这张在伊利诺伊大学台阶上的个人照，定格了他作为文化使者的从容气度。在第二任公使期间，他的交往层次更深，甚至与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立了私人友谊，还拜访了大发明家爱迪生。但他的目光也投向更广阔的海外华人世界，远赴南美慰问侨胞，签订保护侨民的新条约。

投身民主革命（69~80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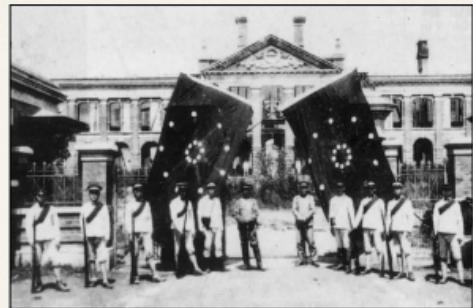


议和大使委任状



伍廷芳与孙中山

在辛亥革命后的政局变动中，伍廷芳的政治立场经历了多重转折，体现出他以国家稳定与宪政秩序为最高原则的独特政治逻辑。1911年，身为革命派代表之一的伍廷芳积极参与南北议和，促成清帝退位与中华民国的和平建立。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延揽伍廷芳出任外交总长，负责与列强交涉，巩固新政府的国际地位，并兼任司法总长，主持司法体系重建与法令整顿。凭借清末修律经验，伍廷芳致力于确立法治与人权理念，推动民国法律制度现代化，成为共和建国初期最重要的法制与外交奠基者之一。



占领武昌后的合影

然而在共和政府初立，权力真空未定之际，伍廷芳对孙中山的政治路线与治国能力深感忧虑，认为其革命理想虽高昂，却未必能在危局中稳住政局。因此他转而支持更具行政经验的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以期借助袁的权力资源与官僚体系完成国家整合。这一阶段伍廷芳被视为「拥袁派」，甚至对孙中山持批评态度。然而，随着袁世凯日益走向专断，尤其是明显违背宪政精神、压制议会与地方力量后，伍廷芳重新认识到孙中山在维护共和制度与抵抗独裁上的历史价值，于是由批评者转为支持者。他在袁世凯帝制风潮逼近时公开反对帝制，并在政治上与孙中山保持一致，共同捍卫共和秩序。伍廷芳这段复杂的政治历程，不是个人立场的摇摆，而是基于对国家局势、人物能力与政治制度稳定性的现实判断，充分体现了他以宪政、共和与国家未来为核心的政治价值观。

1910年，伍廷芳辞去驻美公使一职，结束了他作为清朝外交官的最后使命。当他途经欧洲返回时，已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资深外交家和法政改革家。伍廷芳归国后选择隐居于上海，本意是从此远离官场纷扰，安度晚年。然而历史的浪潮并未允许这位年近古稀的老者真正退隐。

1911年3月，在盛宣怀的推动下，伍廷芳接受了轮船招商局的聘请，出任“议事董事”并当选为董事会会长。盛宣怀此举，旨在借助伍廷芳崇高的社会声誉和在粤商中的威望平衡招商局内部势力。于是，这位资深外交家转而以民营企业家代表的身份，迎来了中国历史的决定性时刻。此时国内政局已至剧变前夜。清廷推行的“预备立宪”因“皇族内阁”的成立而失信于民，“铁路国有”政策更激起了席卷南方的保路风潮。历史没有给渐进的改良留下更多时间。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烈焰迅速燎原。11月3日，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革命党人深感新政权的国际承认至关重要，而西方列强的态度将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沪军都督陈其美“慕公才名，且知为中外所敬服”，以极大诚意派人专程邀请伍廷芳出山。时年已七十岁的伍廷芳，面临着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基于其贯穿一生的法治信念、对世界共和潮流的深刻认知，以及对腐朽清廷的彻底失望，这位古稀之年的前朝重臣，最终做出了顺应历史大势的决定。他接受邀请，出任沪军都督府外交总长，成为该政权中极少数非同盟会成员的资深官员。此举标志着他从清王朝的改良者，转变为共和革命的参与者。

在随之而来的南北议和中，伍廷芳的政治行动始终围绕一个核心：以法律与秩序奠定共和根基。他被推举为南方革命政权总代表，凭借高超的外交智慧与法律专长，在与袁世凯代表唐绍仪的谈判中，不仅在法律程序上妥善安排了清帝退位，更在法理上确立了共和制度的合法性。他参与起草的《清室优待条件》等重要文件，为实现政权的和平过渡提供了关键的法律框架。

民国肇建，百端待举。基于尽快实现国家统一与稳定的现实考量，伍廷芳认为袁世凯掌握着更强的军政实力与行政体系，因而支持其出任临时大总统，希望借此结束动荡，推动宪政步入正轨。这一时期，他常被视为“拥袁派”。但随着袁世凯日益走向独裁，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乃至图谋称帝，伍廷芳的政治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清醒地认识到，袁世凯的道路已彻底背弃了共和与法治的根本原则。于是，他毅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站在一起，公开反对帝制，坚决捍卫宪政。



1916年4月20日，伍廷芳以社会各界之名撰写《致袁世凯书》，旨在劝袁放弃帝制，挽救国家于危局。书信前半采取审慎而富策略的「迂回」写法：他先以客套与赞誉入手，称袁世凯雄谋伟略、胆识过人，且数十年勤劳国事，以至须发苍然。伍廷芳进一步指出自己并非为个人私谊进言，而是代表民众与士绅的共同忧思。

1916年4月20日，伍廷芳以社会各界之名撰写《致袁世凯书》，旨在劝袁放弃帝制，挽救国家于危局。书信前半采取审慎而富策略的「迂回」写法：他先以客套与赞誉入手，称袁世凯雄谋伟略、胆识过人，且数十年勤劳国事，以至须发苍然。伍廷芳进一步指出自己并非为个人私谊进言，而是代表民众与士绅的共同忧思。

在完成礼貌性铺陈后，伍廷芳话锋一转，以「人贵在灵魂之安乐，何必恋总统之尊荣」点出权力与道义的轻重，明确劝袁取消帝制。他指出帝制既悖逆共和潮流，亦将激起各省离心，导致内乱与国祚不稳；为化解危局，他提出一条「保全之道」：劝袁立即让位，借机周游列国，学习各国政治制度，甚至前往印度修习禅与佛学，使其心境脱离权位执念，重得灵魂安宁。伍廷芳强调，若袁能以此脱身，不仅可保全名誉，回国后亦有可能因见识大开而再受国人推举。书信下半以道义、政治与心理三重理由构成完整劝退方案，体现出他深厚的宪政理念与士大夫式的道德担当。

在完成礼貌性铺陈后，伍廷芳话锋一转，以「人贵在灵魂之安乐，何必恋总统之尊荣」点出权力与道义的轻重，明确劝袁取消帝制。他指出帝制既悖逆共和潮流，亦将激起各省离心，导致内乱与国祚不稳；为化解危局，他提出一条「保全之道」：劝袁立即让位，借机周游列国，学习各国政治制度，甚至前往印度修习禅与佛学，使其心境脱离权位执念，重得灵魂安宁。伍廷芳强调，若袁能以此脱身，不仅可保全名誉，回国后亦有可能因见识大开而再受国人推举。书信下半以道义、政治与心理三重理由构成完整劝退方案，体现出他深厚的宪政理念与士大夫式的道德担当。



孙中山就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时与同人合影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陈炯明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中国陷入更为混乱的军阀割据。伍廷芳目睹《临时约法》被毁、国会解散，深感「法统」沦丧是国家动荡的根源。1917年，当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南下广州，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时，伍廷芳以七旬高龄毅然投身其中。这场第一次护法运动，始于孙中山为对抗段祺瑞政府毁法之举，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召集国会非常会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7年9月1日，孙中山被推举为陆海军大元帅，获得领导护法战争的最高统帅权。然而运动根基实则脆弱——军政府虽名义上确立，实权却操于西南军阀之手。

伍廷芳被任命为军政府外交总长，其政治生涯由此转折：从以往在北方政权中「以法律制衡强权」的资深官僚，转变为以实际行动捍卫共和法统的「护法元老」。但面对军阀把持的政府，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处处受制，伍廷芳所擅长的法律与外交手段也难施其力。最终，西南军阀与北洋势力妥协，于1918年5月操纵国会改组军政府，以七总裁会议制取代大元帅制，迫使孙中山去职，第一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1920年，在孙中山的策动与支持下，其长期倚重的军事将领陈炯明率领所部「援闽粤军」回师广东，成功驱逐了盘踞当地的桂系军阀。陈炯明早年加入同盟会，在反清革命和讨袁护法中战功卓著，一度被视为孙中山最可靠的军事臂膀，此次胜利使孙中山得以重返广州，重振革命基地。孙中山此次回归后，决心突破此前护法运动限于一隅的困境。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并明确提出以武力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府、实现全国统一的目标，这标志着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开启，其目标已从最初的「恢复约法」升华为「武力统一、重建共和」。

在此重要关头，伍廷芳被孙中山任命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当孙中山亲赴桂林设立大本营、督师北伐期间，伍廷芳更代行非常大总统职权，成为孙中山在后方最为倚重的核心幕僚与政治支柱。这一时期，伍廷芳已完全认同孙中山以革命武力完成国家统一的方略。他运用其深厚的国际声望与人脉，竭力为广州革命政权争取外交承认与经济支持；同时在内政方面，苦心筹措北伐军费，协调各方关系，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全力支撑着北伐大业。

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国家并未走向安定，反而陷入军阀割据的更深泥潭。《临时约法》形同废纸，国会屡遭解散，“法统”彻底沦丧。目睹此景，年逾七旬的伍廷芳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南下广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高举“护法”旗帜，号召恢复国会与约法。伍廷芳被任命为外交总长，这标志着他从一位曾效力于中央政府的资深官僚，转变为以地方政权为基地、用行动捍卫共和法统的“护法元老”。然而，第一次护法运动的根基并不牢固，实权掌握在各有盘算的西南军阀手中。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处处受制，伍廷芳所擅长的法律与外交手段也难有作为。1918年5月，军阀们操纵改组军政府，迫使孙中山去职，第一次护法运动以失败告终。但革命的火焰并未熄灭。1920年，在孙中山的策划下，陈炯明率“援闽粤军”成功驱逐广东的桂系军阀，为革命力量重建了根据地。1921年4月，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建立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并明确提出以武力北伐、统一全国的纲领。第二次护法运动就此展开，其目标已从“恢复旧法统”升华为“武力统一，重建共和”。

在这关键的历史时刻，孙中山对伍廷芳寄予了极高信任与重托，任命他为外交总长兼财政总长。当孙中山亲赴广西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时，伍廷芳更是在广州代行非常大总统职权，成为后方最重要的政治支柱。此时的伍廷芳，已完全认同孙中山以革命战争完成国家统一的道路。他以古稀之年，倾尽全力：对外，运用其广泛的国际人脉，为广州政权争取外交空间与经济援助；对内，苦心筹措庞大的北伐军费，以其丰富的政治智慧协调内外，支撑着前方的军事行动。从清末的法律改革者，到民国的护法元老，再到北伐大业的后方统帅，伍廷芳的人生轨迹，始终与中国追寻现代法治与国家统一的艰难历程紧密相连。

伍廷芳逝世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却因革命阵营内部的根本分裂而猝然失败。核心矛盾在于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政见与战略的严重冲突。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武力北伐，以实现全国革命统一；而陈炯明则力主「联省自治」，主张先巩固广东，建立地方模范，再以和平协商方式谋求联邦制统一。这一分歧最终演变成公开决裂。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即「六一六兵变」），孙中山险遭不测，被迫离粤，第二次护法运动就此夭折。

叛变发生后，孙中山脱险登上永丰舰。在危急存亡的时刻，伍廷芳展现出了无比的坚定与忠诚。他拒绝与叛军合作，不顾年迈体弱和个人安危，毅然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表达坚决支持。随后，他奉命离舰，以政府代表身份尽力与外界周旋，试图通过交涉途径解决危机。

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对伍廷芳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他毕生信仰的法律、秩序和共和理想，在军阀的枪炮下被彻底践踏；他倾注心血的革命事业，因内部的倒戈而功败垂成。在极度忧愤与心力交瘁之下，伍廷芳一病不起。1922年6月23日，即在陈炯明叛变发生后仅一周，伍廷芳于广州溘然长逝，享年80岁。



伍廷芳墓、伍朝枢墓

伍廷芳逝世后，其遗体安葬于广州白云山麓，后迁至广州越秀公园内（今中山纪念堂东南侧）。孙中山亲笔撰写墓志铭与墓表，以“笃信民权，力行法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赞颂其一生功业，称他为“近代法政之先觉”。

但现在，他的故事，即将迎来最后的高潮与悲壮的终章。

然而，这场声势浩大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却因革命阵营内部的根本分裂而猝然失败。核心矛盾在于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政见与战略的严重冲突。孙中山主张中央集权、武力北伐，以实现全国革命统一；而陈炯明则力主「联省自治」，主张先巩固广东，建立地方模范，再以和平协商方式谋求联邦制统一。这一分歧最终演变成公开决裂。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即「六一六兵变」），孙中山险遭不测，被迫离粤，第二次护法运动就此夭折。

叛变发生后，孙中山脱险登上永丰舰。在危急存亡的时刻，伍廷芳展现出了无比的坚定与忠诚。他拒绝与叛军合作，不顾年迈体弱和个人安危，毅然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会面，表达坚决支持。随后，他奉命离舰，以政府代表身份尽力与外界周旋，试图通过交涉途径解决危机。然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背叛对伍廷芳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他毕生信仰的法律、秩序和共和理想，在军阀的枪炮下被彻底践踏；他倾注心血的革命事业，因内部的倒戈而功败垂成。在极度忧愤与心力交瘁之下，伍廷芳一病不起。1922年6月23日，即在陈炯明叛变发生后仅一周，伍廷芳于广州溘然长逝，享年80岁。

伍廷芳逝世后，其遗体安葬于广州白云山麓，后迁至广州越秀公园内（今中山纪念堂东南侧）。孙中山亲笔撰写墓志铭与墓表，以“笃信民权，力行法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赞颂其一生功业，称他为“近代法政之先觉”。

参考资料

- ◆ 丁贤俊 & 喻作风 (2005) 伍廷芳评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
- ◆ 张礼恒 (2003) 从西方到东方：伍廷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进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
- ◆ 张云樵 (1986) 伍廷芳与清末政治改革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 ◆ 伍廷芳 (2012) 美国人的气质：美国何以如此繁荣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近代法制的改革者 伍廷芳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 亚洲电视 ATV (2011) 《香港望族》第2集：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伍朝枢
YouTube: <https://youtu.be/3OkXdOFFz4g?si=kyuKseV3Lc5Zw20>
- ◆ 鹤发童言：列讲座S01E08. 近代司法改革的伍廷芳困境
YouTube: https://youtu.be/l2oVw58jZlQ?si=l7_80CVNj-3gATZh
- ◆ 陈晓平 (2023) 伍廷芳兄弟与《香港中外新报》的关系
<https://news.qq.com/rain/a/20230227A0GYYVA00>
- ◆ 陈此生 伍廷芳轶事 上海宏文图书馆印行
- ◆ Pomerantz-Zhang, L. (1992). Wu Tingfang (1842-1922): Reform and Modernization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 Champaign County Historical Archives.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07-1949." *UIUC Chinese Scholars and Students Archive*. Omeka. Retrieved from <https://champaigncountyhistory.omeka.net/exhibits/show/uiuc-chinese-scholars-and-students/1907-1949-students-and-schola>
- ◆ Chinese Heritage. *English letter by Wu Ting-fang (伍廷芳) condemning the U.S. Chinese Exclusion Act*. Retrieved October 18, 2025, from <https://www.chinese-heritage.com/index.php/赋梅花馆清赏-2/前清遗藻/item/398-english-letter-by-wu-ting-fang-伍廷芳-condemning-the-u-s-chinese-exclusion-act.html>

证道学在中国

第二部分

刚才我们回顾了伍廷芳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从清末外交、法制革新到民初护法，他始终在探寻一条融汇中西、使国家走向法治与富强的道路。然而，除了为国家政治夙夜操劳之外，伍廷芳还为中国文化融入世界探索了一条独特的路——这正是我们接下来将要展开的第二部分，一段被遗忘的关于“证道学”在中国的故事。

证道学（神智学会）成立



布拉瓦斯基夫人与奥尔科特上校



安妮·贝森特

证道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于187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由海伦娜·彼洛夫娜·布拉瓦茨基（H.P. Blavatsky）、亨利·斯蒂尔·奥尔科特（Henry S. Olcott）与威廉·库恩·贾奇（William Q. Judge）三人共同发起。布拉瓦茨基以其东西合璧的神秘思想奠定了学会的哲学基础，奥尔科特推动组织制度化并担任首任会长，而贾奇则负责美国分会的扩展，使证道学迅速在英语世界传播。学会提出“普世博爱、比较研究宗教、哲学与科学”“探索自然与心理之隐秘规律”三大目标，强调跨宗教、跨文化的思想融合。创立后的证道学会吸引了欧洲知识分子、东方学者及宗教改革者，成为19世纪末全球灵性思想复兴的重要节点。



证道学阿迪亚总部

1882年，证道学会将总部迁至印度马德拉斯南部的阿迪亚（Adyar），标志着组织从欧美向东方精神传统的核心地带转移。迁址后的阿迪亚不仅地理上更接近印度与南亚的宗教文化，也成为布拉瓦茨基、奥尔科特与后来的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推动改革与思想传播的基地。奥尔科特时期，学会积极参与南传佛教复兴及教育事业；贝森特加入后，阿迪亚成为全球证道学网络的中心，她通过出版物、学校、社会运动，将学会影响力扩展至东亚、澳大利亚与欧洲，使阿迪亚成为国际灵性思想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时至今日，阿迪亚仍是证道学会的世界总部，象征其跨文化、跨宗教的精神传统。

证道学纪录片 ONE FIR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XUJ1N7hikIw>

这个故事要从 1875 年美国创立证道学学会说起

当时学会由三位发起人奠定了它的基石：

- 一、海伦娜·布拉瓦茨基夫人，一位充满争议却又极具魅力的俄国女性，她以其融合东西方神秘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庞大思想体系，为学会提供了核心的哲学与灵性基础。
- 二、亨利·奥尔科特上校，他是学会的首任会长，一位卓越的组织者，将松散的团体建设成一个制度化的国际机构。
- 三、威廉·贾奇，他则在美国大力拓展分会，使证道学思想迅速在英语世界传播开来。

学会创立之初就提出了三大宗旨：

1. 建立一个人类普世兄弟情谊的核心，不分种族、信仰、性别、种姓。
2. 鼓励对宗教、哲学与科学进行对比研究。
3. 探索自然与人类潜能的未知法则。

这三大宗旨，清晰地指向一种超越单一宗教、融合东西智慧、探索精神与物质世界统一性的宏大追求。这使得证道学会迅速吸引了欧洲一大批对传统宗教不满、对东方智慧好奇、并对新兴科学（如心理学、进化论）抱有开放态度的知识分子、艺术家和社会改革者，成为19世纪末全球“灵性复兴”运动的重要推动力。

一个关键的转折发生在 1882 年。证道学会做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决定：将全球总部从纽约迁往印度马德拉斯的阿迪亚。这一迁址绝非偶然，它标志着该组织从西方思想的输

出地，主动转向了东方精神传统的核心地带，宣示了其真诚学习并根植于东方智慧的决心。迁至阿迪亚后，这里成为了证道学运动真正的全球中心。在奥尔科特时期，学会积极投身于斯里兰卡等地的佛教复兴运动，并创办学校。而后来加入并成为领袖的安妮·贝森特——一位才华横溢、充满激情的英国社会活动家、演说家和作家——更是将阿迪亚的影响力推向高峰。她通过大量的出版、演讲、教育和社会改革项目，将证道学的思想网络扩展到东亚、澳大利亚和欧洲，使阿迪亚成为全球灵性思想交流的一个重要枢纽。

上海尚贤堂



李佳白
(John Gilbert Reid)



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上海尚贤堂会员合影



上海尚贤堂开放日



尚贤堂宴请美国商团
伍廷芳与史登夫妇

李佳白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82年来华。他长期深入中国社会，通晓中文并广泛接触士绅阶层，逐渐形成独特见解：仅靠基层传教难以推动中国整体变革，需采取「自上而下」策略影响精英阶层。1894年，他在北京提出创办「尚贤堂」的构想，旨在通过高层次思想交流促进社会进步。这一理念获得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盛宣怀等清廷重臣支持。1897年经清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宗旨定为「调和中外、沟通教俗、培养通才」，成为超越单一宗教与文化的高端对话平台。同年，为拓展活动空间，尚贤堂迁至上海法租界。1903年重组后的董事会涵盖中外精英：会长由清廷官员吕海寰担任，董事包括伍廷芳、美国商人与领事等各界人士。李佳白与其友人李提摩太共同倡导「宗教比较」与「多元共存」，认为各宗教内核存在相通的「普遍真理」。尚贤堂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最早制度化的宗教对话平台，定期汇聚孔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领袖，围绕「各教皆以劝人为善为本」展开讨论。

那么证道学是如何进入中国的呢？当我们探讨证道学思想如何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时，有一个机构及其创办人无法绕过，那就是上海的尚贤堂，以及它的创办者——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李佳白。

李佳白的父亲约翰·雷德（John Reid）是长老会教会牧师，对中国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兴趣，读多不少中国的经史典籍。受父亲的影响，李佳白从少年时起，即开始习读中国的儒家经典，并学习中文，对中国更是心驰神往。李氏于 1882 年来华传教，在中国深入生活了十多年后，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判断：如果仅仅在民间进行基层传教，很难真正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变革。于是，他转而采取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策略，将目光对准了能够影响社会思潮的上层士大夫与知识精英。他的这一想法，最初于 1894 年在北京提出，希望能创办一个名为“尚贤堂”的机构。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构想获得了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盛宣怀等清廷顶级高官的初步认同。1897 年，清政府正式批准成立。尚贤堂的宗旨非常鲜明：“调和中外、沟通教俗、培养通才”。它从一开始，就定位为一个超越单一宗教与文化的高级交流平台。

同年，为了获得更开放的运作空间与更广泛的资源，1903 年，尚贤堂的重心移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在这里，一场由中美绅商和官方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式重建了尚贤堂并成立了董事会。董事名单堪称一份当时中外精英的名录：会长由清朝官员吕海寰担任，而董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伍廷芳，与他并列的还有美国商人、领事等各界要人。

尚贤堂的核心灵魂人物李佳白，和他的另一位著名传教士朋友李提摩太一样，长期倡导“宗教比较”与“多元共存”。他们相信，从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再到伊斯兰教，其内核都存在可以相通的“普世真理”。因此，尚贤堂迅速成为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制度化的宗教与思想对话场域，各教领袖常汇聚于此围绕“各教皆以劝人为善为本”展开讨论。

归隐观渡庐的伍廷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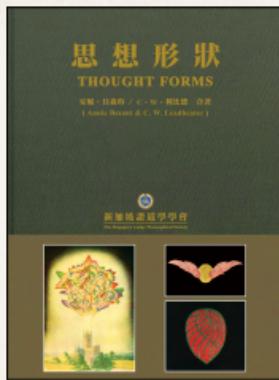


各国领事访问观渡庐会见伍廷芳



现于上海静安区北京西路1094弄2号

在南京临时政府通过法定程序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转移至袁世凯后，伍廷芳辞去了司法总长职务于，于1912年至1916年再次归隐上海观渡庐，自谓「仆处海隅，尘事罕接」。他并未选择传统文人的退隐方式，而是栖居「华洋杂处」的上海，践行中西结合的生活方式。在此其间，他深度参与并主持尚贤堂事务，担任董事会主席，多次发表演讲，促进中外思想交流。他还积极倡导振兴实业、使用国货，研究养生与精神修养，并组织工商界参与国际活动，如菲律宾博览会。与此同时，伍廷芳利用闲暇时间潜心著述，整理旧稿，完成《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斐律滨赛会记》《美国视察记》等著作，系统阐述其思想与实践心得。



1916年1月，伍廷芳在尚贤堂就证道学主题发表演讲。同年3月，《上海时报》刊登了伍廷芳即将举办讲座的公告，称其将以《人的灵魂与肉体之关系》为题，探讨「证道学的另一课题」。根据《学生杂志》（1916年第3卷第4期）的报道记载，伍廷芳当时向观众展示了《思想形状》一书：「西人著有一书，系用摄影法照人之气，各图详列。请诸君一览焉。凡人慈善阴恶，图中皆有形色为分列。末图系向赌博场中所照，中心现圆形，盖赌者一心为利己也，可不慎哉。」在这次演讲中，伍廷芳首次系统阐释灵魂学说，将道教「炁」「鬼」的概念与证道学的理论相结合，被视为证道学式思想在中文语境中首次成体系呈现，也成为后来证道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思想源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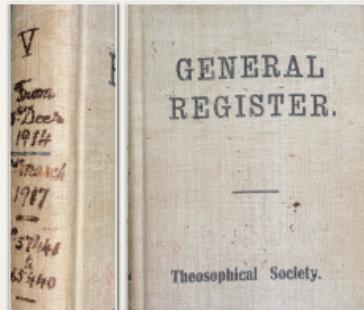
虽然伍廷芳在尚贤堂成立之初便已加入，但他得以深度参与并领导其活动，直接契机是其个人生涯的重要转折：1912年，随着南京临时政府通过法定程序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转移至袁世凯，伍廷芳选择辞去公职，归隐上海观渡庐，开始了长达四年半的寓公生活。他将这段岁月形容为“仆处海隅，尘事罕接”。与一般退隐田园、寄情诗画的旧式文人不同，伍廷芳并未远离时代舞台。他蛰居于“华洋杂处”的上海，过着中西交融的生活，并在此期间积极投身于尚贤堂的各类事务，后来更担任其董事会主席。他在堂内发表多场重要演讲，内容涵盖中西文明比较、宗教哲学融合、法治精神与证道学等议题，吸引了大量中外精英参与讨论，有效促进了民国初年上海中外思想界的交流与相互理解。

与此同时，伍廷芳还多方面拓展其社会与文化实践：一方面，他大力倡导振兴实业、使用国货、推广素食、研究灵魂之学，组织成立“天人明道会”，试图“治儒佛耶回诸教精义于一炉”，并推动工商界参与国际活动如菲律宾博览会；另一方面，他笔耕不辍，整理旧稿，先后撰写了《延寿新法》《中华民国图治刍议》《斐律滨赛会记》《美国视察记》等一系列著作，系统总结与传播其思想。

1916年1月，伍廷芳与梅殿华在尚贤堂就证道学主题发表了一次极为重要，且颇具影响力的演讲。同年3月，《上海时报》刊登了伍廷芳即将举办讲座的公告，称其将以《人的灵魂与肉体之关系》为题，探讨“证道学的另一课题”。根据《学生杂志》的报道记载，伍廷芳当时向观众展示了《思想形状》一书：「西人著有一书，系用摄影法照人之气，各图详列。请诸君一览焉。凡人慈善阴恶，图中皆有形色为分列。末图系向赌博场中所照，中心现圆形，盖赌者一心为利己也，可不慎哉。」在这次演讲中，伍廷芳首次系统阐释灵魂学说，将道教「炁」「鬼」的概念与证道学的理论相结合，被视为证道学式思想在中文语境中首次成体系呈现，也成为后来证道学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思想源头。



★ 克罗托纳 (Krotona) 证道学学院 1925年摄



虽然伍廷芳正式加入证道学会的记载是在 1916 年，但伍廷芳接触证道学要远早于该时期，大概是第二次赴美期间所了解到的，根据现有资料的推测，伍廷芳应该曾在 1909 年的 7 月在美国见过贝森特。而待伍廷芳回国后，据记载 1911 年 7 月，伍廷芳在伦敦举行的“首届世界民族大会”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华文明的论文，安妮·贝森特作为赞助人出席，甘地亦随行。伍博士表示更推崇中华文明，他援引儒家经典阐释中华文明理念：“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观点或许与证道学会的第一个宗旨——即“普世兄弟情谊”相呼应。伍博士的论文亦被 1911 年 10 月出版的《证道人》杂志刊载。

组织建立与思想传播



夏斯特里
(Hari Prasad Shastr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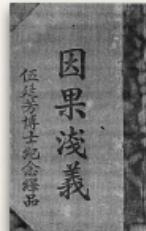


梅殿华
(C. Spurgeon Medhurst)

1916年前后，伍廷芳与梅殿华在上海积极推动证道学传播，并组织了学习小组。1917年，伍廷芳因参与护法运动并出任政府要职，无法常驻上海；在此期间，梅殿华创建了「探索学会（Quest Society）」，举办法会、办宗教、炼金术等主题讲座。1918年，上海部分证道学爱好者参与该组织活动后，自发形成了证道学学习圈。1919年6月26日，卡特上尉（George W. Carter）与夏斯特里教授在上海法租界建立了中国首个正式证道学土星分会，初期成员13人，一年后增至28人。夏斯特里担任首任会长。中国成员每周日组织学习圈及中文讲座，伍廷芳虽政务繁忙，仍对分会给予支持。1920年，伍廷芳被推举为荣誉会长。1922年，他在上海创立了中国人主导的「太阳分会」，并出版首部中文证道学手册《伍廷芳灵魂学说》。与此同时，1921年梅殿华携妻子前往悉尼访问C. W. 利比德，进一步巩固了证道学在中国的早期基础。伍廷芳与梅殿华对证道学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随着伍廷芳于1923年逝世，该运动的发展一度减缓。



GROUP AT A SATURN LODGE MEETING LATER, SHANGHAI & SUN LODGES



李佳白尚贤堂的成功，宛如在思想界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广泛的涟漪。它所倡导的跨文化、跨宗教对话，在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催生了一股寻求超越性智慧的热潮。在这个背景下，证道学作为一种系统性的融合学说，开始从松散的交流，走向有组织的传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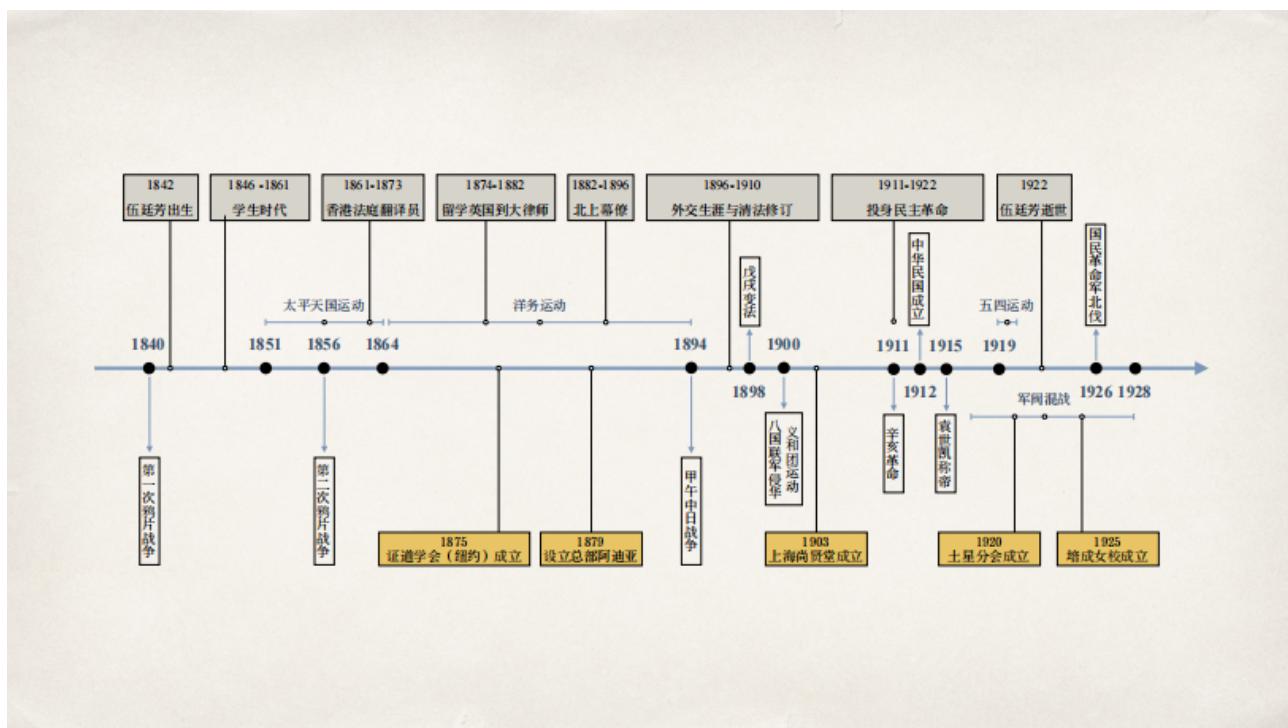
大约在 1916 年前后，伍廷芳与另一位关键人物——英国汉学家、作家梅殿华——开始积极在上海推动证道学的传播。他们最初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学习小组”，进行定期的研讨。这可以看作是中国证道学组织化的雏形。

然而，历史的大潮很快将伍廷芳卷入其中。1917年，他毅然南下广州，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先后担任了非常国会外交总长、乃至代理总理等要职，无法再常驻上海主持这些文化活动。就在这个空档期，梅殿华挑起了在上海传播思想的重任。他创立了名为“探索会”（Quest Society）的组织，持续举办关于宗教哲学、神秘学乃至炼金术等主题的公开讲座，为对证道学感兴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交流平台。思想的种子一旦播下，便会在自己生长。1918年，一些经常参加“探索会”活动的上海本地爱好者，自发组成了更具针对性的证道学“学习圈”。这个自发团体的出现，标志着从“听众”到“研习者”的转变，为建立正式组织铺平了道路。所谓水到渠成。1919年6月26日，在两位核心人士——英国船长乔治·卡特和印度学者夏斯特里教授的牵头下，中国第一个正式的证道学会分会在上海法租界宣告成立，命名为“土星分会”。成立之初有13名成员，一年后便增长到28人，由夏斯特里教授担任首任会长。分会每周日举办学习活动，并开始尝试进行中文讲座，致力于将深奥的教义本土化。

尽管此时伍廷芳正在南方为护法事业奔波，日理万机，但他始终关心着上海的思想阵地，以各种方式对分会的运作给予支持，期间他将 Theosophy 翻译为多个中文名，一开始叫通神学会，后来伍廷芳担心人们望文生义，误以为旁门左道，又增加道德二字，名为道德通神会，后来又觉“通神”二字意义不确切，改成天人明道会，最后改成“证道学”一直沿用至今。学会后来为了表彰他的先驱贡献与精神号召力，1920年，分会推举伍廷芳为“荣誉会长”。

伍廷芳的志向不止于此。他希望证道学能真正由中国学者主导，扎根于本土。1922年，他在上海亲自推动建立了第二个分会——“太阳分会”，其特色正是由中国人主导运作。同年，他还出版了可能是第一部系统性的中文证道学手册《伍廷芳灵魂学说》，将其多年思考汇集成册，为中文世界的学者提供了重要文本。

也在这一时期，梅殿华夫妇于1921年离开上海前往澳大利亚，与全球证道学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C. W. 利比德交流，这进一步巩固了上海分会与国际网络的联系。可以说，在伍廷芳与梅殿华这一中一外两位核心人物的共同努力下，证道学在1920年代初期的中国，完成了从思想引入、到小组研讨、再到建立正式分会与出版中文典籍的完整奠基过程。一个颇具规模的知识社群在上海形成了。然而，历史的转折总是突然。随着1922年伍廷芳的突然病逝，这场方兴未艾的思想运动失去了它最具威望和影响力的中国舵手，发展势头一度减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黎明社与培成女校



多萝西·阿诺德
(Dorothy Arnold)



培成女校大门



培成博士(贝森特)
(Annie Besant)

伍廷芳晚年对证道学的信念，早已超越了个人研习的范畴。他明确提出“以灵性启迪教育，以道德实现大同”的主张，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当超越宗教与民族的界限，着力培育具有普世博爱情怀和公民责任感的新人。这一理念在他1920年于香港会见爱尔兰诗人、证道学家詹姆斯·卡辛斯时得到了具体体现——他承诺个人资助对方两千卢比，邀请其来华巡回讲学，推广证道学与艺术教育。虽然这个计划因政局动荡未能成行，却清晰表明：在伍廷芳看来，教育不仅是实现证道学社会理想的核心手段，更是重建中国精神文明的关键途径。

1922年伍廷芳逝世后，他的教育理想由其追随者多萝西·阿诺德女士接续。1924年，阿诺德重整上海证道学组织，成立“黎明社”，由蒋君瑞任社长，徐仁懿女士任副社长。在成立大会上，徐仁懿以流利英语发表演讲，展现了卓越的学识与抱负。翌年（1925年），在徐仁懿家族的资助下，阿诺德创办了培成女校，以证道学全球领袖安妮·贝森特之名命名，旨在通过“心智与灵性的双重启发”培育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新女性。

然而，在这所寄托着中西融合理想的女校内部，文化理念的潜在冲突逐渐显现。校长阿诺德坚持推行英式教育范式，而负责校务的徐仁懿则主张教育必须扎根中国文化，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双方分歧不断加剧，最终在1928年1月彻底决裂。徐仁懿辞去职务，带领大部分中国师生离开学校，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公开信，强调“教育主权应归中国人所有”，呼吁“收回教育权”。

伍廷芳晚年对证道学的信念，早已超越了个人研习的范畴。他明确提出“以灵性启迪教育，以道德实现大同”的主张，认为真正的教育应当超越宗教与民族的界限，着力培育具有普世博爱情怀和公民责任感的新人。这一理念在他1920年于香港会见爱尔兰诗人、证道学家詹姆斯·卡辛斯时得到了具体体现——他承诺个人资助对方两千卢比，邀请其来华巡回讲学，推广证道学与艺术教育。虽然这个计划因政局动荡未能成行，却清晰表明：在伍廷芳看来，教育不仅是实现证道学社会理想的核心手段，更是重建中国精神文明的关键途径。

1922年伍廷芳逝世后，他的教育理想由其追随者多萝西·阿诺德女士接续。1924年，阿诺德重整上海证道学组织，成立“黎明社”，由蒋君瑞任社长，徐仁懿女士任副社长。在成立大会上，徐仁懿以流利英语发表演讲，展现了卓越的学识与抱负。次年（1925年），在徐仁懿家族的资助下，阿诺德创办了培成女校，以证道学全球领袖安妮·贝森特之名命名，旨在通过“心智与灵性的双重启发”培育具有世界公民意识的新女性。

然而，在这所寄托着中西融合理想的女校内部，文化理念的潜在冲突逐渐显现。校长阿诺德坚持推行英式教育范式，而负责校务的徐仁懿则主张教育必须扎根中国文化，建立符合本土实际的现代女子教育体系。双方分歧不断加剧，最终在1928年1月彻底决裂。徐仁懿辞去职务，带领大部分中国师生离开学校，并在《申报》上连续发表公开信，强调“教育主权应归中国人所有”，呼吁“收回教育权”。

智仁勇女校



仓圣明智大学



哈同夫妇



智仁勇女校与校长 徐仁懿



校长办公室照片

离开培成后，许仁懿立即获得社会名流罗迦陵（Luo Jialing）的支持——罗为沪上富商哈同（Silas A. Hardoon）之妻，热心佛学与社会公裁。许仁懿在罗家爱俪园（Aili Yuan）花園内借地创办了智仁勇女校（Trinity School for Girls），以“智、仁、勇”为校训，象征德智兼修、勇于革新的新女性精神。智仁勇女校的创办得到上海教育界与家长的广泛响应，原培成女校的学生中有一半以上随她转入新校。至此，培成女校（即贝桑学校）与智仁勇女校形成分立局面。前者继续由外籍校方主持，后者则成为中国人自办女子教育的象征。1928年1月的这场分裂，标志着证道学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从理想化的国际合作转向民族自主的教育诉求，也揭示了中西文化理念在灵性教育中的根本冲突。

这场分裂并未中断中国证道学教育的探索。离开贝桑女校后，徐仁懿在沪上慈善家哈同夫人罗迦陵的支持下，于爱俪园内创办了智仁勇女校。新校以“智、仁、勇”为校训，致力培养德智兼修、勇于革新的新女性，迅速获得社会广泛响应，原贝桑女校过半学生随她转入。

在徐仁懿女士的离开，标志着培成女子学校一个时代的结束，却也开启了它的另一段旅程。徐仁懿带走了大部分师生资源后，学校的主导权逐渐转移，进入了我们可称之为“中国化管理时期”。原校长多萝西·阿诺德女士虽在短期内继续留任，但随着外籍教师资源减少和原有资金渠道中断，学校的运营越来越依赖于上海本地的支持者。

后期培成女校

◆ 1928年徐仁懿离开后，成培女子学校的主导权逐渐由曹氏家族接手，进入了「中国化管理时期」。根据记载，徐仁懿脱离学校后，原校长多萝西·阿诺德留任数年，但随着在华外籍教师的减少与财政来源中断，学校的运营日益依赖上海本地资助者。此时，活跃于慈善与教育界的曹云祥家族介入学校事务，并接管校务管理。曹家成员担任理事与校董，学校的中文名改称「培成女子学校」，继续沿用成培学校的校舍与设备。

◆ 在曹氏的主持下，学校逐步转型为一所普通中小学教育为主的女子学堂，减少证道学课程与灵性教育内容，强调实用知识与道德教育的结合。虽然校训与教育理念仍保留了「真理（Truth）、博爱（Brotherhood）、宽容（Tolerance）」等证道学核心词汇，但其宗教与神秘学色彩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兼具现代教育与爱国启蒙精神的教学模式。曹家成员多具有中西教育背景，他们在经费、课程与社会联系上给予学校新的生命，使之得以在动荡的1930年代延续。

◆ 然而，这一时期的培成学校已不再是证道学运动的精神中心，它演变为一所由中国人自主管理、适应本土社会需求的普通教育机构。学校的首要职能，回归到了那个时代更为迫切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人才。根据后续历史记载，在多年的变迁和调整中，培成女校变成了如今的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1936年 培成女中校徽



曹云祥



曹静渊

就在这个时期，一个活跃于上海慈善与教育界的家族——曹云祥为首的家族——开始介入并最终接管了学校的实际管理。曹家成员出任学校的理事与校董，学校的中文名称也更明确地定为“培成女校”，但仍在原址沿用之前校舍与设备。在曹氏家族的主持下，培成女校的办学方向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它逐渐转型为一所普通中小学教育为主的女子学堂，原先作为核心的证道学课程与系统的灵性教育内容被大幅减少。学校的重点转向了实用知识与国民道德教育的结合。

当然，转变并非全然割裂。学校的校训与核心理念中，仍然保留了“真理”、“博爱”、“宽容”这些源自证道学的核心词汇。但其中浓厚的宗教与神秘学色彩被显著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融合了现代科学教育、爱国思想启蒙与传统道德培养的务实教学模式。曹氏家族成员多具备中西结合的教育背景，他们在经费筹措、课程设置与社会联络上为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其得以在局势日益动荡的1930年代继续生存与发展。

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时期的培成女校，本质上已不再是证道学运动在中国的精神中心与前沿阵地。它演变为一所由中国人自主管理、适应本土社会需求的普通教育机构。学校的首要职能，回归到了那个时代更为迫切的需求——为社会培养受过现代教育的女性人才。根据后续历史记载，在多年的变迁和调整中，培成女校变成了如今的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

边缘化与延续

◆ 1936年，印度阿迪亚总部任命克努森为证道学会东亚区代表，他与夫人把中心设在上海，认为这里「比香港更接近真实的中国」。克努森致力于推动证道学典籍的中文化工作，邀请学者翻译核心著作，如吉纳拉贾达萨的《证道学第一原则》(First Principles of Theosophy)与贝森特的《古老的智慧》(The Ancient Wisdom)。1937年，国际会长吉纳拉贾达萨从日本回印途中在上海停留多日，发表演讲并在「纯净业力学会 (Pure Karma Society)」主持佛学讲座，现场配有中文翻译，强调在东方文化与西方灵性哲学之间建立桥梁。1938年1月21日，克努森将由鸳湖金慧莲等人翻译的《证道学》(Theosophy)中文版呈交阿迪亚总部，标志着系统化中文译著工作的完成，也成为证道学在中国最后一次有组织的学术成果。



克努森
(A. F. Knuds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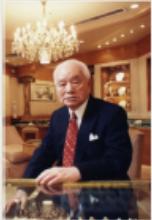


吉纳拉贾达萨
(Jinara jaddisa)

◆ 然而，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彻底中断了中国的证道学运动。根据1939年的报告，日本军队摧毁了缅甸、荷属东印度与菲律宾的分会，而上海、香港与新加坡的支部亦陷入停顿。讲座、出版与翻译活动全部终止。到194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证道学组织几乎全部消失，仅有少数旧成员在私人圈子中继续研究冥想思想；1949年后，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学会活动在大陆完全终止。



冯公夏



施刚巽

◆ 战后，证道学的影响中心转移至香港与东南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分会一度停止运作；至1946年12月，曾有委员会试图重启活动却未果。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59年，由冯公夏先生担任会长、施刚巽先生负责财务的八人团体正式向国际总部申请重建分会，并于同年1月获颁新宪章。尽管此后分会未留下公开活动记录，但其精神脉络通过私人读书与翻译事业得以延续——1961年由冯公夏资助出版朱宽译本《礼足恭听录》(即《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1972年再由施刚巽出资重印，成为阿迪亚图书馆中罕见的中文文献。

正当培成女校逐渐褪去其鲜明的证道学色彩，转向更为本土化的普通教育时，在大环境的另一端，证道学的思想火种并未完全熄灭，反而在上海经历了一场系统化、学术化的“最后闪光”。1936年，印度阿迪亚总部任命了一位新的东亚区代表——A. F. 克努森 (A. F. Knudsen)。克努森夫妇选择将活动中心设在上海，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比香港更接近真实的中国”。克努森到任后，推动了一项至关重要的基础工作：证道学核心典籍的系统中文翻译。他邀请学者，将诸如吉纳拉贾达萨的《证道学第一原则》以及安妮·贝赞特的《古老的智慧》等经典著作译成中文。

1937年，当时的国际会长吉纳拉贾达萨本人，在从日本返回印度的途中，特意在上海停留多日。他发表公开演讲，并在“纯净业力学会”主持佛学讲座，现场配有中文翻译。他反复强调的，正是要在东方传统文化与西方灵性哲学之间建立理解的桥梁。这一年，可以说是证道学在上海学术传播的一个高峰。这项翻译事业的成果，在1938年1月21日得以凝结。克努森将由鸳湖金慧莲等人翻译完成的《证道学》中文版正式呈交给阿迪亚总部。这标志着系统化的中文译著工作初步完成，也成为了证道学在中国最后一次有组织、成规模的学术成果。

然而，历史的洪流无情地中断了这一切。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彻底摧毁了这场思想运动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根据1939年的一份报告，战火不仅摧毁了东南亚多地的分会，上海、香港等地的活动也完全陷入停顿。讲座、出版、翻译全部终止。到194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证道学组织已近乎完全消失，仅有个别老成员在私人小圈子中延续着思想的薪火。1949年后，随着社会环境的根本性变化，有组织的学会活动在大陆画上了句号。

战后，证道学影响的火炬，转移到了香港与东南亚。香港分会一度在战火中停摆，战后恢复的尝试也步履维艰。直到1959年，一个由冯公夏先生任会长、施刚巽先生负责财务的八人团体，才成功向国际总部申请，重建了香港分会。虽然此后公开活动记录稀少，但其精神脉络通过私人的坚持得以延续：1961年，由冯公夏资助出版了《礼足恭听录》(即《At the Feet of the Master》，今译为《在真师膝下》)的中译本；1972年，施刚巽先生又

出资重印。这些薄薄的册子，静静地躺在阿迪亚图书馆中，成为了那段跨越半个世纪、从上海到香港的思想接力，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的中文见证。

参考资料

- ◆ 饶玲一 (2013)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尚贤堂研究 (1894 ~ 1927)
- ◆ 钟山儿 (2025) 伍廷芳博士及证道学在中国的历史
- ◆ 上海戏剧学院附属高级中学官网 (2023) 校史钩沉 No.1 ~ 4
- ◆ 唐超 (2023) 老上海学校：智仁男女校
- ◆ Chuang Chienhui (2020) Theosophy across Boundaries: Chapter 4
- ◆ Josephine Ransom (1966) A Short History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 ◆ Jinara jadasa (1925) The Golden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 ◆ Josephine Ransom (2005) The Seventy-Fifth Anniversary Book of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伍廷芳的精神世界

第三部分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三部分，伍廷芳的精神世界。

重思儒释道

- 伍廷芳对儒、释、道的理解，是在其证道学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的系统性融贯与超越性诠释。他并非将三教视为孤立或对立的体系，而是认为它们共同源于并指向同一个至高无上的「天道」或「真理」。
- 对儒家的诠释：他认为儒家并非仅仅是世俗伦理，其核心在于「穷理尽性」、「天人合一」。儒家所讲的「仁义道德」是天道在人伦社会的具体展现，而「格物致知」则是通向宇宙真理（天道）的实践路径。他将孔子、孟子尊为「天道」的使者，其教化使命与各教圣贤无异，旨在引导人「自化化人」，成就圣贤品格。
- 对佛教的诠释：他特别吸收并理性化了佛教的「因果轮回」学说。他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科学原理来比拟「业力」法则，认为因果报应是宇宙间如物理定律般精确、公正的自然规律，而非人格神的随意奖惩。他视佛教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本质相通，都是天道之仁的体现。
- 对道教的诠释：他高度重视道教的实修传统，特别是其养生炼气、修性修命的功夫。他将「精、气、神」对应于宇宙的「真火」，认为通过食素、静坐等修炼，可以涵养生命本源，强化人身内在的「光」与「能」，最终实现身心与天道的沟通，乃至获得「长生」的基础。他认为道教的内丹修炼与证道学探索的「人身潜能」高度一致。



三教图

*《三教图》是明代画家丁云鹏创作的纸本设色图轴，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作品以佛、儒、道三教融合为背景，通过虚构三位代表人物共坐论道的场景，寄托对三教思想的崇敬。

在我看来伍廷芳的精神世界，绝非杂乱无章的混合，而是一座经过他精心设计、试图融贯中西、打通古今的思想大厦。伍廷芳对西方宗教的研究虽然在幼年时期打下了基础，但系统的了解中国文化则是在中晚年，在伍廷芳证道学说这本书的序言中，求真子便提到：「伍公本從耶教於釋儒道三教前實茫然無知，迨屆暮年始專心致志以學，似有心得」，从他零散遗留下来的资料来看，他以证道学为框架，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进行了极具个人色彩的“现代化”与“普世化”诠释。

首先，他对儒家的解读就非同寻常。他认为，儒家绝不仅仅是世俗的人伦纲常。在他看来，儒家的核心—“穷理尽性、天人合一”——指向的是宇宙的最高真理（天道）。孔子、孟子，在他眼中是“天道”的使者，其使命与各教圣贤并无二致，都是引导人完善自我、教化社会，最终与天道相合。

对于佛教，他特别看重并“科学化”了“因果轮回”学说。他用物理学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来解释“业力”，认为因果报应是宇宙间像万有引力一样精确、公正的自然法则，而非神明的随意奖惩。这样，佛教的“慈悲”便与儒家的“仁爱”一样，都是同一宇宙之“仁”的体现了。

而道教，则为他提供了身心修炼的具体法门。他深信道教内丹学说中关于“精、气、神”的修炼，认为通过素食、静坐等方法，可以强化人内在的生命能量（他称为“真火”或“光”），最终实现身心与天道的沟通，甚至为“长生”奠定基础。这与证道学探索人类潜能的目标不谋而合。

东西合璧的理想

伍廷芳的根本论点即荀子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儒、释、道、耶、回乃至天下一切正教，皆是同一「道」（或称「上帝」、「大生命」）在不同地域与历史中的启示与显现，其核心宗旨无不以「劝善惩恶」为本，致力于引导世人超越物质欲望与肉体局限（「兽性」），唤醒并发展内在灵性，最终实现「与天合一」的至善境界。他认为，各教之间的差异仅在于外在的礼仪、形式与表述方式，而非根本真理的相悖。为此，他引入证道学会，正是为了彻底打破宗教门户之见，以理性与科学精神研究各教「秘理」，融汇其精义，从而直接探究并践行那个普世的「天道」。他提出，学习证道学非但不会背离任何原有信仰，反而能使人借助跨宗教的比较与科学的验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传统的奥义，消除无谓的教派纷争。他以「牧羊」为喻：天帝如主人，各教教主如牧人，羊群（信徒）虽有不同牧人引领，却同属一主，其根本目标皆是守护灵魂、导人向善。因此，他坚信通过证道学的修习与传播，最终能实现「合天下各教为一家」的世界大同境界。他对诸教的理解与整合，是一种在普世主义灵性哲学统摄下，兼具理性诠释、科学印证与实修导向的全面融合。



「应该记住，一个宗教不可能垄断所有的真理；充其量只呈现出其一面，就像光谱所照那般。每个好宗教的创始者都散布了真理的某些部分，以适应人们的条件和习惯，假设一个宗教包含真理的全部未免太自大了。真理就像『光』，人们首先用油照亮他们的房子，然后他们制造蜡烛并使用它们。近期煤气也加入使用了，并且我们现在有了电灯。然而我们是否应该仍然使用石油或蜡烛提供的『光』，而拒绝由天然气或电力所提供更明亮的照明呢？光明向所有人开放，真理也是如此。真理是无法穷尽的：就像一个深不见底的泉水或井水，我们所处得越低，找到的水便就越多。我们永不会被眼前的真理满足，我们越是调查和发现，真理对人类就越好。智慧的人将会用他所有的光去收到更多的光，他会不断进步到对真理的认识。」

伍廷芳的根本信念，可以用荀子的一句话概括：“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他认为，儒家、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等，所有正教都是同一个至高无上的“道”在不同文化和时代的显现。它们外在的仪式、教条虽有不同，但核心宗旨都是“劝善惩恶”，引导人超越动物性的欲望，唤醒内在灵性。因此，他创立证道学会，就是为了打破宗教门户之见，用理性与科学精神，融汇各教精华，直达那个普世的真理。

论鬼魂

伍廷芳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度出任驻美公使期间，深度接触了当时在欧美方兴未艾的各类灵学研究团体。他不仅系统研读相关著作，更亲身参与被视为「科学实验」的降灵活动。据其自述及友人记载，在一次灵魂照相实验中，他成功获得一张身后显现三个模糊人形的合影，并详细「辨认」出影像身份——一位故去的「前英国公使」、一位陌生的美国人，以及一位头戴中式小帽、身份不明的华人。伍廷芳坚称自己不仅「看到」了这些影像，更曾与他们进行过「交谈」。这张照片成为他日后最重要的「物证」，被其视为灵魂客观存在且能跨越生死进行交流的科学证据。1916年至1920年间，赋闲并定居上海的伍廷芳将其灵学信仰带入公共领域。他受尚贤堂、江苏省教育会等机构邀请，多次发表关于「灵魂学」与「证道学」的演讲。在这些场合，他不仅阐述理论，更将美国所摄的「鬼影照片」制成幻灯片或印制品公开展示。据《申报》等报刊记载，1916年8月16日在江苏省教育会补习学校的演讲尤为轰动：现场座无虚席，听众逾二百人，伍廷芳在讲述「人能永久不死，所死者躯壳，而不死者灵魂」之理时，当场出示三张「身后有鬼影」的照片供听众传观，并娓娓道来其在美国「与鬼谈话」之经历，致使「满座鼓掌如雷」。这种以「视觉证据」结合「亲身经历」的演说策略，极大地冲击了公众认知，使他的灵学主张从书斋讨论演变为轰动沪上的公共文化事件。伍廷芳并未止步于公共宣讲，他将这些超常体验系统整理为私人著述。据记载，他撰有《灵学日记》一厚册，自1919年4月起详尽记录研究灵魂问题的一切心得；另著有《鬼夜友谈录》，专记其一生与鬼交谈的实录。这些手稿本是其思想体系最私密、最直接的载体，惜于1922年陈炯明叛变引发的总统府火灾中焚毁，成为学术研究的一大遗憾。

他的这一信念，并非仅仅来自书斋思考，更源于他自认为亲身经历的实证。在担任驻美公使期间，他深度参与了当时欧美流行的灵学研究，甚至宣称在一次“灵魂照相”实验中，成功拍到了已故者的影像，并与他们“交谈”。这张照片成了他最重要的“物证”。

1916年在上海，他将这种超常体验带入了公共视野。在江苏省教育会的一次著名演讲中，他不仅阐述灵魂不灭的理论，更当众展示这些“鬼影照片”，讲述自己“与鬼谈话”的经历，引起巨大轰动。据《申报》记载，现场“满座鼓掌如雷”。这使他从一位学者，变成了一位用“科学证据”挑战公众认知的公共人物。为了系统记录这些体验，他私下撰写了《灵学日记》、《鬼友夜谈录》等手稿。遗憾的是，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在1922年广州总统府的火灾中被焚毁，成为永久的遗憾。

110

素食与养生

伍廷芳自四十岁起便严格奉行素食主义，并将其与系统的静坐修炼紧密结合，形成一套完整的身心修养体系。他所著的《延寿新法》一书，正是这一体系的理论结晶。在书中，伍廷芳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道家养生学说（特别是「精、气、神」的修炼理论）与现代西方医学、营养学知识相融合。他并非主张传统的「蔬食斋戒」，而是推崇一种他称为「卫生素食」的科学化饮食，即以鸡蛋、牛奶、乳酪等富含营养的食材为主，辅以蔬菜、水果与五谷，旨在洁净血液、增强消化、滋养「真火」（生命能量）。他认为，这种饮食配合静坐导引，能使「精足、气旺、神强」，从而达到祛病延年、甚至「长生久视」的生理基础。伍廷芳的静坐修炼，也远超一般的保健功法。他自称在深度入静时可达「思虑全消，脏腑澄清，身躯轻了大半，似漂浮空际，羽化登仙」的体验。这不仅是身体上的松弛，更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与解脱，是其「证道学」理念中「人神一体」境界的直接体验。因此，他的素食与静坐，绝非仅仅为了健康长寿，而是其整个灵性修炼工程中不可或缺的筑基功夫。素食是为了净化肉身载体，为「神」提供清明的居所；静坐则是为了息妄归真，唤醒内在的「慧能」，最终实现与「天道」的感通合一。这一套修炼实践，随着伍廷芳1910年归国而被迅速推广。他旋即在上海创立了「素食协会」（后亦称为“神智卫生会”），这不仅是倡导一种饮食方式，更是传播其融合了科学、养生与证道精神的整套生活哲学。

IMMORTAL FOOD

齋

JAI

Dr. Wu Tingfang, the former Ambassador from China to the United States, told his friends that he would return to America in fifty years. He said this as he left the United States. He was then over sixty years old. His reason for expecting long life is that he lives entirely on dishes which contain no meat.

Buddha said that if you will live forever. There are many dishes which contain no meat.

字。有數十款之多。博士到京以後。享用了好幾個月。常對人說。『紹軒變是真知己哩。』蓋博士是一個大衛生家。常以二百歲自期。草素。常吃山芋和薯子。長生不老之類。每日早晨。生雞蛋四枚。此外。均用素菜。外國人稱他為蔬菜大家。但有人說。博士名為吃素。他的家人。都是用很肥的雞鴨。配別的素。以供給他。此次在廣州總統府會餐。博士要吃素點。他的兒子伍朝樞。要請厨子用明湯煮。以進。博士吃了。連稱味美。在座的人。無不服素的。說來必樂。博士的衛生學。確乎可謂童顏白髮。令人一見。就知道這是一位尊崇兼到的老八星。七十餘歲。上樓梯。都是用退步。我記得上一次遼東運動會的時候。老博士在報上。登了一段佈告。要和全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快步競走。竟是沒有一個人敢和他比賽。博士一生好

他的精神修炼不仅停留在思想和灵异体验层面，更有一套严格的身体实践。他从四十岁起就坚持素食，但这并非普通的吃斋，而是一套他称为“卫生素食”的科学化营养体系，旨在净化身体。同时，他长期修习静坐，追求在深度入静中达到“身躯轻了大半，似漂浮空际”的超越性体验。

对他而言，素食是为了净化承载灵魂的肉身“殿堂”，静坐则是为了唤醒内在的灵性“慧能”。二者结合，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必修功课。为此，他早在1910年就在上海创办了“素食协会”（后称“神智卫生会”），推广这套融合了养生、科学与灵修的整体生活方式。

综上所述，伍廷芳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庞大而自洽的体系：它以证道学的普世真理为穹顶，以理性化、科学化诠释的各教精华为梁柱，以灵性体验为个人印证，再以严格的素食与静坐修炼为身心基石。他试图用这套体系，为自己，也为那个彷徨的时代，找到一条融合科学与宗教、贯通个体生命与宇宙法则的终极出路。理解了这个精神内核，我们或许才能更全面地读懂伍廷芳——他不仅仅是一位外交家、改革家，更是一位在时代剧变中，孤独而执着地构筑自己灵魂圣殿的思想探索者。

参考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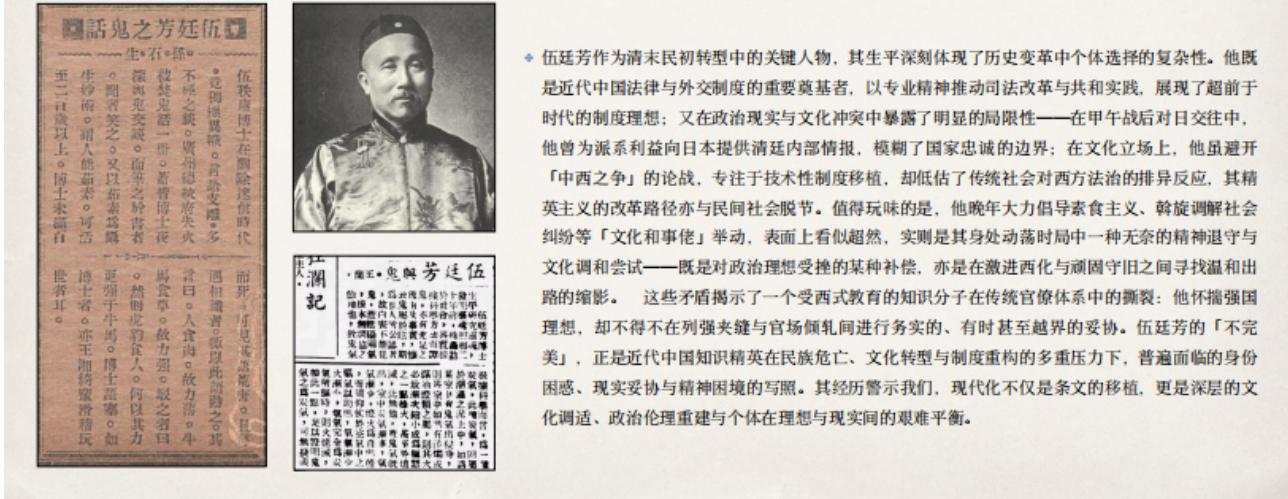
- ◆ 张洪彬 (2018) 伍廷芳证道学研究: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
- ◆ 《伍廷芳博士证道学问答摘要》，《天津佛教居士林林刊》，第2-3期，1927年
- ◆ 伍廷芳 (1914) 延寿新法
- ◆ 伍廷芳 (1910) 美国视察记
- ◆ 伍廷芳证道学说
- ◆ 施秉章 (1944) 扶乩的原理: 伍廷芳博士以新旧学说证明 新民声第13、14期
- ◆ 司徒亚当 (1946) 伍廷芳与鬼为伍: 吉普週刊, 第11期
- ◆ 王宏超 (2017) 鬼形神影: 灵魂照相术在近代中国: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
- ◆ Wu Tingfang (1916) Chinese Religion through Hindu Eyes: Introduction

评议与重思

第四部分

现在让我们进入第四部分，评议与重思。

人无完人



伍廷芳作为清末民初转型中的关键人物，其生平深刻体现了历史变革中个体选择的复杂性。他既是近代中国法律与外交制度的重要奠基者，以专业精神推动司法改革与共和实践，展现了超前于时代的制度理想；又在政治现实与文化冲突中暴露了明显的局限性——在甲午战后对日交涉中，他曾为派系利益向日本提供清廷内部情报，模糊了国家忠诚的边界；在文化立场上，他虽避开「中西之争」的论战，专注于技术性制度移植，却低估了传统社会对西方法治的排异反应，其精英主义的改革路径亦与民间社会脱节。值得玩味的是，他晚年大力倡导素食主义、斡旋调解社会纠纷等「文化和事佬」举动，表面上看似超然，实则是其身处动荡时局中一种无奈的精神退守与文化调和尝试——既是对政治理想受挫的某种补偿，亦是在激进西化与顽固守旧之间寻找温和出路的缩影。这些矛盾揭示了一个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传统官僚体系中的撕裂：他怀揣强国理想，却不得不在列强夹缝与官场倾轧间进行务实的、有时甚至越界的妥协。伍廷芳的「不完美」，正是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在民族危亡、文化转型与制度重构的多重压力下，普遍面临的身份困惑、现实妥协与精神困境的写照，其经历警示我们，现代化不仅是条文的移植，更是深层的文化调适、政治伦理重建与个体在理想与现实间的艰难平衡。

伍廷芳，无疑是清末民初大转型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他的一生，深刻地体现了在历史巨变中，个体选择的极端复杂性与内在矛盾。一方面，他是一位具有超前眼光的制度奠基者。他以专业的法律素养，推动了中国近代司法改革与外交体系的初步建立；他投身共和实践，晚年以七旬高龄毅然护法。这些行动背后，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对现代法治与共和制度的真挚理想。但另一方面，他在政治现实与文化冲突中，也暴露出明显的局限性。历史研究显示，在甲午战争后的复杂对日交涉中，他曾为维护自身所属派系的利益，向日本方面提供过清廷内部的情报。

在文化立场上，他有意识地去避免卷入当时激烈的“中西体用”之争，而专注于技术性的制度移植。这固然是一种务实的策略，却也让他低估了中国传统社会肌体对西方法治观念可能产生的强烈“排异反应”。他的改革路径是精英主义的，自上而下的，某种程度上与广大的民间社会是脱节的。尤其值得我们玩味的是他晚年的转向。他大力倡导素食主义、热心斡旋民间纠纷，扮演着“文化和事佬”的角色。这些举动表面上超然物外，但究其本质，或许正是他身处理想受挫、时局动荡中的一种无奈的精神退守与文化调和尝试。这既是对政治抱负未能完全实现的一种补偿，也是在激进的“全盘西化”与顽固的“保守复古”之间，艰难寻找一条温和、渐进中间道路的缩影。这些矛盾，揭示了一个深受西式教育洗礼的知识分子，被嵌入传统官僚体系后所遭遇的深刻撕裂：他胸怀法治强国、文明进步的宏大理想，却不得不在列强的夹缝与官场的倾轧中，做出极其务实、有时甚至不得不越界的妥协。因此，伍廷芳的“不完美”，恰恰是最具历史价值的地方。他的困惑、他的妥协、他的困境，并非个例，而是近代中国整整一代知识精英的普遍写照。在民族危亡、文化转型与制度重构的三重压力下，他们承受着巨大的身份焦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点。

大时代思潮背景下的伍廷芳



文化守成派（保守传统）

- 核心理念：坚持「中华本位」，认为传统伦理与制度是立国之本，西学仅为辅助工具。
- 关键人物：辜鸿铭、王先谦、章太炎（后期）。
- 典型主张：「中学为体」是绝对原则，反对制度与文化层面的西化。

渐进调和派（中体西用/渐进改革）

- 核心理念：在保持文化认同与传统核心的基础上，系统且有选择地吸纳西方制度与技术，注重融合与渐进改造。
- 关键人物：张之洞、梁启超、严复（后期）。
- 典型主张：法律可改，宪政可立，但道德伦理与社会根基须以传统为依归。

全面革新派（激进西化/革命）

- 核心理念：视传统为现代化根本障碍，主张在政治、法律与文化各层面推行全面而激进的西方化变革。
- 关键人物：陈独秀、胡适（文化层面）、孙中山（政治层面）。
- 典型主张：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废除礼教、倡导科学与民主。

如果我们将那个时代的思潮人物划分为三类，那么分别是保守派、渐进调和派和改革派，伍廷芳无疑是渐进派的代表人物，这三个派别不是同时出现的，他们分别体现了中国文化遭遇外来冲击后随时间变化的反应，伍廷芳生前屡屡遭到来自保守派的章太炎唾弃，章太炎称他过于圆滑世故，缺乏个人立场。而伍廷芳曾经也在革命是否需要彻底进行这一问题前犹豫过，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但最终我们都知道，革命派赢得了这次最终的胜利，伍廷芳的经历给予了我们一个深刻的警示：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法律条文或政治制度的移植。它更是一个涉及深层文化心理调适、政治伦理重建的漫长而痛苦的进程。当然这不光是伍廷芳本人，也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在其理想追求与现实处境之间，不断进行艰难权衡与选择的微观历史。回顾伍廷芳，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传记，更是一面折射出那个复杂时代的棱镜。他的光与影，他的进与退，共同构成了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化之路的一个无法绕开、充满张力的坐标。

伍廷芳证道学运动的积极影响

- ◆ 提供非基督教的现代精神方案：在科学与现代化压力下，证道学为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不依附教会的现代精神与哲学路径。
- ◆ 提升中国文明的世界地位与文化自信：通过「普世智慧」框架，将儒、释、道置于世界文明谱系之中，反驳某方中心主义与文明等级论。
- ◆ 推动宗教比较与现代学术视野：倡导以理性、历史与哲学方式研究宗教，促进宗教学与比较哲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
- ◆ 连接精神修养与社会改革：将个人道德提升与宪政、共和等公共政治理想相结合，为改革者提供道德—精神论述资源。
- ◆ 促进中西思想的平等对话：以证道学为中介，构建中西文明「相互理解而非单向输入」的交流模式。

现在在对伍廷芳与证道学的故事进行最后的总结之前，让我们将目光稍稍拉开，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一看，证道学这场思想运动，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它留下了哪些值得深思的积极影响？

首先，它为处在时代夹缝中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非基督教”的现代精神方案。在 20 世纪初，“现代化”常常被等同于“西化”，而“西化”在精神层面又往往与基督教传教活动紧密相连。证道学则不同，它虽然源自西方，却主动拥抱东方智慧，它提供了一套融合科学、哲学与跨宗教灵性的论述体系。这让许多既想拥抱现代理性、又不愿皈依基督教的知识分子，找到了一个可以安放精神世界的、具有现代性的框架。

其次，它有助于在心理层面提升中国文明的地位，重塑文化自信。证道学的“普世智慧”论，将儒家、道家、佛教置于与基督教、印度教等平等的世界精神谱系中，认为它们都是同一宇宙真理的不同表达。这有力地挑战了当时盛行的西方中心论和文明等级论，从哲学层面论证了中国传统智慧并非“落后”，而是人类共同精神遗产的重要部分，为知识界找回文化底气提供了思想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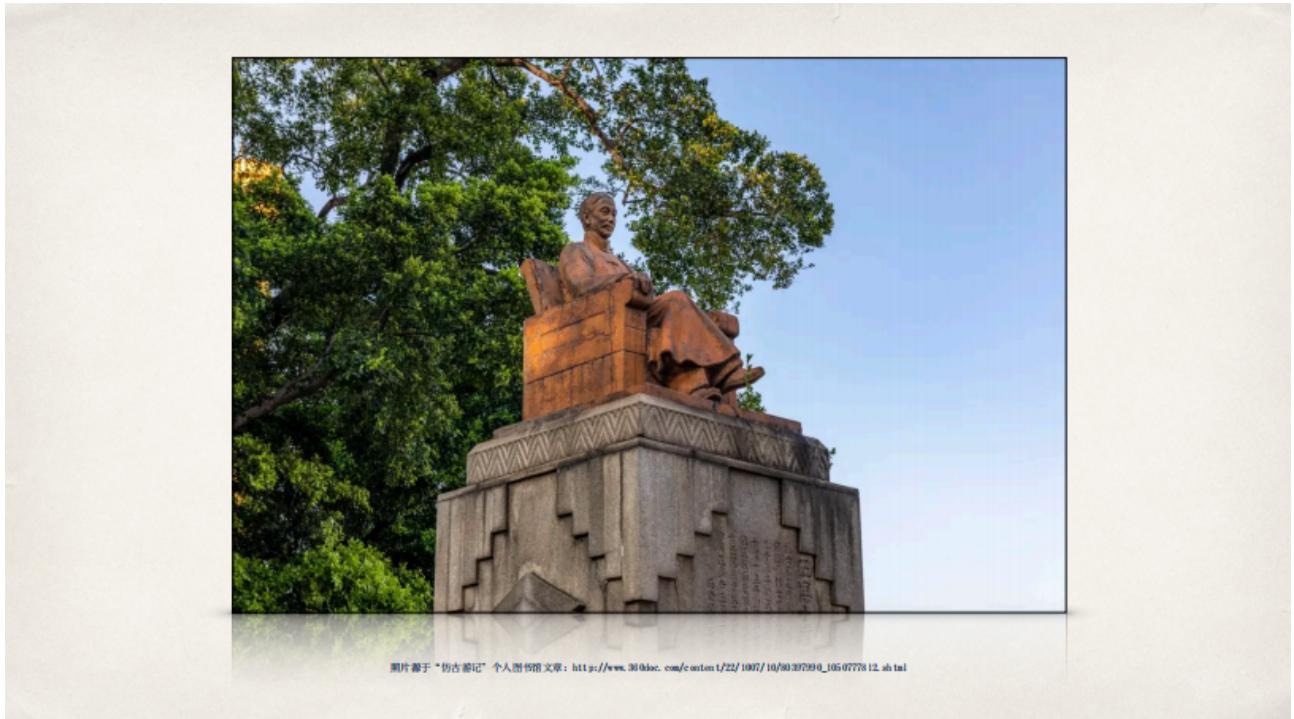
第三，它推动了宗教研究的理性化与现代学术视野。证道学强调以理性、比较和历史的方法研究各宗教，这种态度促进了宗教学、比较哲学等现代人文学科在中国的早期启蒙，使得对传统信仰的研究，开始从单纯的信仰或排斥，转向客观的学术探讨。

第四，它尝试连接个人的精神修养与宏大的社会改革。在伍廷芳等人身上，我们看到，证道学并非出世之学。它将个人道德的完善、灵性的觉醒，与建立宪政、实现共和等社会政治理想紧密结合，为改革者提供了一套融合内在道德动力与外在制度追求的“精神 行动”论述，使改革不仅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有道德根基的。

最后，它促进了一种趋向平等的中西思想对话模式。证道学本身就是一个东西方思想交融的产物。以它为中介，中西文明的交流，不再是单向的“教师与学生”关系，而是转变为

一种在“普世真理”平台上相互理解、相互诠释的对话关系。这为超越简单的文化对立，探索更深层次的文明互鉴，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早期实践。

当然我相信，这些积极作用也绝非证道学的专利，同一时期出现的尚贤堂、大同教都在某种意义上给予了相同的作用，但他们却没有多少人能像伍廷芳这样做到知行合一。他在变革浪潮中既深植思想根基，又躬身践行，将理念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真实力量。这种思想与行动的高度统一，正是他最值得我们铭记与追随的地方。



鸣谢

主办方

新加坡 证道学学会 (Singapore Lodge Theosophical Society)

部分图像版权机构

上海图书馆

澳大利亚 悉尼 证道学学会 (Theosophical Society of Sydney)

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 档案馆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 中国历史照片 项目

资料贡献

钟山儿 侯朝雄 杜巍巍 张洪彬

Leo Ta Ellie

今天我的讲座内容至此已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耐心聆听。

新加坡证道学学会
公众号：证道学世界



中文网站：<https://chinesetheosophy.net/>

英文资料网站：[Theosophy World](https://www.theosophy.world)
<https://www.theosophy.world>

如有任何关于证道学，证道学学会和入会的问题，
请微信至：SLTS1875

或电邮至：admin@chinesetheosophy.net

如果决定入会，请登录新加坡证道学学会的中文网站，在“联系我们”
一栏里直接在网上填表申请